

雙紅堂文庫所藏戲曲考*

黃仕忠

廣州中山大學

中國古文獻研究所

提 要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之雙紅堂文庫，係日本法政大學教授、書誌學家長澤規矩也博士之舊藏。其中收藏之戲曲、俗曲甚為豐富，且多稀見之本，但向未見全面的介紹與研究，故本文略作嘗試。本文分三個部分。

上篇：介紹長澤規矩也氏收藏戲曲俗曲之經過。長澤規矩也從小隨祖父出入書肆，喜歡尋訪古書。後從鹽谷溫學習，始關注戲曲小說。大學時就在日本發掘出明宣德十年所刊孤本戲曲《嬌紅記》。自1927至1932年六次前往中國，展開以中國文學為中心的書誌學研究，並代為靜嘉堂文庫購買漢籍。在認識戲曲小說研究專家馬廉（隅卿），得觀孔德學校藏書之後，長澤規矩也更致力於鈔本戲曲、俗曲的收藏。其所為，對促使中國學界關注此類文獻之收集，有著直接影響。此外，也十分關注對日本舊家散出的戲曲小說版本的收集。故其所藏，多孤本或稀見之什。五十年代初，為購新宅，長澤將所藏之戲曲小說藏書出售給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該所為設「雙紅堂文庫」。

中篇：介紹雙紅堂所藏雜劇、傳奇戲曲之價值。主要介紹其中傳奇、雜劇作品之孤本、稀見本，略述其在戲曲史或版本研究方面的意義與價值。

下篇：介紹雙紅堂所藏清代雅部、花部戲曲及俗曲曲本。重點介紹所藏之內府鈔本、百本張鈔本、藝人及戲曲愛好者的鈔本。

關鍵詞：長澤規矩也、雙紅堂文庫、戲曲小說稀見書、俗曲曲本

* 本文為日本住友財團資助項目「日本所藏中國戲曲の文獻學的研究」之相關成果。

引 言

雙紅堂文庫為原日本法政大學教授、書誌學家長澤規矩也博士的舊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用1951、1953兩個年度的科學研究費，從長澤氏手中購得所藏三千餘冊戲曲、小說，為之設立專門文庫；1961年一月，值該所成立二十周年之際，又從長澤手中補充了小說戲曲書籍一百五十餘冊，隨後編成經長澤規矩也手訂的《雙紅堂文庫分類目錄》，刊行於世。

雙紅堂文庫以收藏孤本、稀見本戲曲小說而名聞於世。然向未見專門而系統的介紹。筆者嘗讀雙紅堂文庫所藏戲曲，頗有得益，甚慕長澤規矩也之學術與為人。去歲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一輯（與金文京、喬秀岩合編，2006），其中收錄戲曲文獻凡四十四種，而出自雙紅堂文庫者達十四種。又由文庫所藏清代女詞人顧太清的稿本戲曲《桃園記》（署雲槎外史填詞），而得以參稽考訂顧太清早年的婚史，成〈顧太清的戲曲創作與早年經歷〉一文，初交於廣州中山大學所舉辦之國際戲曲研討會（2006年四月，廣州），嗣後正式發表於《文學遺產》2006年第六期，頗受學界關注。又為文庫中向未編目之千餘冊「唱本」，編成〈雙紅堂文庫藏清末四川唱本目錄〉、〈雙紅堂文庫藏清末民初北京木刻、石印本唱本目錄〉、〈雙紅堂文庫藏民初北京排印本唱本目錄〉，分別載於《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一四八（2005年十二月）、一五〇及一五一冊（2007年三月）。此外，就筆者所見，舊目之戲曲部分，亦頗有著錄錯誤之處，故草就《雙紅堂文庫所藏戲曲目錄》，且待覆核後問世。並擬將雙紅堂文庫所藏全部戲曲與俗曲之尚未披露部分，加以影印出版。¹又讀《長澤規矩也著作集》，鉤稽其在中國訪書之經歷，以及收集戲曲小說之經過，以為對於瞭解1920年代前後學界收羅中國通俗戲曲與俗曲之過程，亦有意義。本文對長澤規矩也之訪書經歷作一考索，並對雙紅堂文庫所藏之曲籍作一初步的介紹，亦以表彰這位先行者的功績。

上篇、長澤規矩也之蒐書經歷

長澤規矩也（1902-1980），日本著名書誌學家。字士倫，號靜庵，神奈川人。1925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文學科。他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

1 此項工作得到大木康教授支持，並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認同，正在進行之中。

代，曾七次赴中國，以尋訪中國古籍與和刻漢籍為主要目標。畢生致力於以中國文學及漢籍為中心的書誌學研究。所撰〈現存明代小說書刊行者表初稿〉（上、下）（《書誌學》三卷三號及五號，1934）、〈明代戲曲刊行者表初稿〉（《書誌學》七卷一號，1936），對明代刻工研究，有開創之功；所撰《漢籍解題》，後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文獻學界有著很大的影響。所撰〈日本現存戲曲小說類目錄〉（《文字同盟》第七號，1927）、〈家藏舊鈔曲本目錄〉（《書誌學》四卷四號，1935）、〈家藏曲本目錄〉（《書誌學》八卷三號，1937）、〈家藏中國小說書目〉（《書誌學》八卷五號，1937）、〈家藏中國曲本小說書目錄補遺〉（《書誌學》十三卷一號，1939）等，²首次比較全面地對日本所藏中國戲曲作了梳理，其成果後來為傅惜華編中國古代戲曲之系列目錄所吸收。

長澤與其他日本學者關於日本所藏中國小說戲曲文獻的調查介紹，引起中國學界的廣泛關注。1930年代初孫楷第東渡日本，在東京尋訪中國通俗小說，完成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目《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胡適在為孫氏此書所作的序中這樣強調：「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日本做了中國舊小說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這許多的舊刻小說，我們絕不能真正明瞭中國短篇與長篇小說的發達演變史！我們明白了這一點，方才可以瞭解孫先生此次渡海看小說的使命的重大。」³而孫氏東渡，得到了長澤規矩也直接的介紹與幫助。同樣，1938年之歲末，傅芸子在東京訪曲，也有賴長澤之力。⁴從長澤所撰〈民國時代の友〉一文（1963），⁵介紹與胡適、鄭振鐸、郭沫若、馬廉的交往，可見他與中國學界交往之一斑。鄭振鐸、馬廉等人的戲曲小說研究，均有得益於長澤之處。

此外，現代日本各公私圖書館所藏漢籍之編目、分類整理，長澤規矩也的功績最為突出。他不僅主要參與或主持靜嘉堂、內閣文庫、成實堂文庫、大東急記念文庫之漢籍分類目錄的編纂，而且通過自己的工作，為日本的漢籍編目定下了基調。他為三十餘所公私機構編製了漢籍目錄，晚年編有《未刊諸文庫古書分類

2 以上各篇後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5。

3 胡適，〈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序〉（1932年7月24日），頁292-293。

4 傅芸子（1802-1948），傅惜華之兄。1932年赴日，任京都帝國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講師，主講中國語言文學。1938年11月至12月間，在東京訪曲，撰有〈東京觀書記〉、〈內閣文庫讀曲記〉、〈續記〉，後收入《白川集》。又，2001年1月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第4輯有簡體字版，與《正倉院考古記》合刊。惜該版刊落原書之圖版，且書前陳子善所撰之「本書說明」，已不知芸子之卒年，可知斯人之落寞。

5 〈民國時代の友〉（交遊抄），《日本經濟新聞》，1962年4月22日。

目錄》等。又為圖書館工作人員提供諮詢。並據訪查所見，編成《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又擇和刻漢籍之重要者予以影印。正是由於長澤規矩也的創導和努力，才使日本之漢籍編目取得長足進步，為今日人們尋訪海外佚存書籍提供了方便。

長澤規矩也從中學時就因舊式和漢辭書使用不便，而有編集辭典的念頭。長澤所纂《新撰漢和辭典》（1937），對以往的漢和辭書的部首檢索有很大的改革，並且已經有知識產權之價值。出版方告知此項成果已可申請專利，但他卻更願意學界隨意使用，所以，此後的漢和辭典編纂，多採納長澤所改良的部首索引。

1962年，長澤規矩也以《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歴史》獲博士學位。1966年，以支那書誌學研究包括辭典部首的革新方面的成績而獲頒紫綬褒章。瀧川政次郎博士稱讚長澤規矩也：「青壯年時期為日本的書誌學開拓了新領域，晚年遍歷國內之古文庫，致力於其中所藏的漢籍之保護、表彰，使江戶時代所覆刻的主要漢籍悉數復刊，使江戶時代埋沒於世的漢學家的著作得以出版，使國民重新認識江戶時代的文化，厥功至偉。」⁶

長澤規矩也曾寫有〈わが蒐書の歴史の一斑——戯曲小説書を中心に〉一文，回憶自己收集戲曲小說的過程。晚年所撰〈收書遍歴〉一文，又從不同角度回憶自己訪書的經歷。⁷今以此兩文為主要線索，參考《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共十一卷）所錄其他篇什，略就其時之背景作一補充說明，概述於後。從中也約略可見日本漢學之轉型，以及中國俗曲之受關注的過程。

長澤規矩也從小由祖父龜之助扶育長大。龜之助畢業於長崎師範學校，主要通過自學成才，成為出色的數學家，並以翻譯西洋數學書而自成一家。因編譯教材之版稅收入，家遂富饒。龜之助無子，贅寸美遠（本姓後藤）作養子，是為規矩也的父親；母親長澤滋是家中的二女兒。規矩也出生時，父母尚是學生，故主要由祖父扶養長大。作為長男，規矩也尤得祖父珍愛。

祖父給他起這個名字，是希望他成為一名數學家。入中學以後，長澤就明白自己並沒有數學方面的潛質，而是更喜愛文史。這又與祖父的影響有關。祖父於

6 《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1卷序。

7 〈わが蒐書の歴史の一斑〉，見《雙紅堂文庫分類目錄》，頁71-74。又《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6，頁167-177。〈收書遍歴〉，前掲書，頁203-287。

數學之外，酷愛史書，喜歡朗誦詩文，尤其熱心於收集和、漢歷史和詩文書籍，而「唐本」則幾乎是從不購買。祖父對規矩也說：「要是數學不成，就做歷史或漢文。」

從小學開始，長澤規矩也就是祖父的「隨從」，經常陪著去神田的書店，挑書、買書，觀聽長輩的交談。由於耳濡目染，長澤規矩也從小就熱衷於此道。當時，一般人進入大學後，才會流連於書店，而長澤則從小學開始，就已經頻頻出入於古書店，開始按自己的興趣購書、藏書了。所以，數學雖未學成，國文成績卻非常優秀。大正十年（1921）以文科甲等的成績考入第一高等學校。他的志向是研究日本漢學史。

但是，大正十一年（1922）一月，家中不慎起火，十餘萬卷藏書一時化為灰燼。失去了研究資料，長澤也想過是否轉向專攻支那史。箭內互等特地熱心地勸說。但「一高」的先輩倉石武四郎氏⁸給予更熱心的誘導，把他介紹給漢學家鹽谷時敏、安井小太郎，⁹從而改變了長澤未來的學術方向。大正十一、二年間，在鹽谷青山的菁莪塾參加《文選》的輪讀；大正十一年至昭和二年（1922-1927），每個星期天都向安井樸堂學習經學。同時，還在東京外國語學校專修科（夜校）支那語部學習漢語。就這樣，長澤為將來專攻支那哲學科，邁出了第一步。

但是，入大學之前，長澤對選擇支那哲學、還是支那文學，陷入了迷茫。東京大學的支那學當時招收哲學、文學兩科學生。長澤規矩也對文學本無特別的熱情，亦非擅長。至於哲學，他與倉石武四郎一樣，不喜歡宋學。所以倉石把他拉到鹽谷溫在同心町的住處，為他作了介紹。當時，鹽谷溫是東京大學支那哲學支那文學的第二講座教授。¹⁰因著這樣的機緣，並不喜歡文學的長澤規矩也，只是

8 倉石武四郎（1897-1975），字士桓，新潟縣高田市人，1921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支那文學科。次年成為東大的特選公費生，但因對傳統「訓讀」方法有不滿，中途退學，於1922年轉入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師事狩野直喜、鈴木虎雄等。1939年以《段懋堂的音韻學》獲博士學位。後任教於京都帝國大學；1949年後專任東京大學教授。

9 鹽谷時敏（1855-1925），漢學家，字修卿，號青山。第一高等學校教授。著有《青山文鈔》、《文章截錦》、《漢文類別》等。安井小太郎（1858-1938），漢學家，本名安井朝康，號樸堂。大東文化學院教授。著有《論語講義》、《日本儒學史》等。

10 鹽谷溫（1878-1962），號節山。鹽谷時敏之子，是史學世家的第四代漢學家。1909年前後曾留學長沙，師從葉德輝，研習中國戲曲。1920年以《元曲研究》獲博士學位，陞任文學部支那哲學支那文學第二講座教授。擅長於戲曲小說之研究。據東大校史稱，該校中國文學之教育、研究，真正名實相符，始於鹽谷溫。

因爲討厭宋學，選擇進入了文學科。

鹽谷溫當時已經準備帶大學院生，但尚無正式學生，所以就給長澤講授爲大學院生準備的《元曲選講義》。爲此，長澤規矩也從上海訂購了一套影印版《元曲選》。這也是他買的第一部戲曲書。《元曲選》的受講，成爲他蒐集戲曲小說書的開端。

長澤從大學到大學院生師事鹽谷溫時，正是鹽谷溫一生學術之鼎盛時期。而長澤涉足戲曲小說之收集與研究，實因鹽谷溫的影響。鹽谷溫主持《國譯元曲選》，讓學生演繹，在課堂上講授討論，長澤是參與人之一。

上大學以後，必須用到上海出的新書，若向文求堂等書店購買，價格太高。祖父說，他在上海有熟人，可請人代購。因而由祖父的舊知東亞公司桑野締三氏作介，陸續從上海購書。僅收五分的手續費，遠比文求堂便宜。所以長澤能夠第一時間從中國獲得最新的出版物。

當時，家裏給長澤規矩也的零花錢是每月二十日圓，而古書特別購入費是一百日圓。大部頭的書，或在中京、京阪等處買的，還在這一百日圓之外。這樣的優裕條件，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事實上長澤規矩也一生未嘗爲生計犯過愁。對於學術，更多的是基於興趣，故而能使其學問始終保持著一種無功利的純粹特性。這更是後人所難以企及的。

大正十四年（1925）九月十二日，大學三年級學生長澤規矩也，閒逛東京大學赤門對面的琳琅閣，主人向他推薦用舊報紙包著的宣德十年刊本《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二冊，說此書係從日本故家散出，因蟲蝕過甚，沒有書店願意收購，主人原用十七日圓收下，願以二十日圓轉讓。長澤此前還從未買過十日圓以上的古書，所以先借了回來。一查，乃是世間孤本，便欣喜地去給鹽谷溫看。又請教和田萬吉博士，託池上製本所修補重裝。裝禎完畢，已是十月二十八日。付錢時，長澤對書店主人說，這是天下無雙的孤本，價錢再高一點也沒關係。但琳琅閣主人並未多收。結果以書價二十日圓、修補費十日圓得手。這是長澤畢生發掘的第一本孤本，他的書齋名雙紅堂，一半是因爲此書。此書隨後由鹽谷溫主持影印，於昭和二年（1927）公諸於世。長澤則寫了〈明宣德刊本《嬌紅記》についての所感〉一文，刊於昭和三年（1928）十一月出版的《斯文》雜誌上（第十編第十一號）。

長澤規矩也從此正式踏入中國古籍收藏者與發掘者的行列。

同年十二月，據名古屋的松本書店的目錄，花四十日圓買了寬延刊本唐書八十二冊，外加郵費。又由祖父陪同專門去名古屋松本書店參加展銷會，收購了三重旭旦齋的幾本舊藏書。從別的書店買了貫華堂原刊本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三十二冊，七日圓；隨帶清刊本《玉嬌梨小傳》，一圓三十錢。此外，在京都買了巾箱本《第一奇書》，八日圓，萬治四年刊本《南華真經注疏解經》，六日圓。

大正十五年（1926）三月，長澤規矩也從東大支那文學科畢業，進入大學院學習；研究題目為「支那文學の書誌學的研究」。六月，為三菱財團的靜嘉堂文庫從事編目，並受託為文庫購書（至1939年七月止）。靜嘉堂文庫自購得陸心源舊藏後，尚未編目，故涉足此項工作，對長澤後來拓展日本書誌學領域，具有重要意義。

昭和二年（1927）六月，逢前田家尊經閣文庫的一部分藏書出售，得到了沐日堂刊本《爾雅注疏》、清初楊素庵刊本《天工開物》、明崇禎刊本《孝經大全》、明萬曆刊本《升庵先生文集》、板本節山舊藏寫本《胡言漢語》等。這些購買經歷，為此後長澤連續多年赴中國收購古籍，作了輔墊。

是年，以「孔子の祭祀に關する研究」為題，獲得外務省文化事業部補助。八月，為調查研究而赴中國，滯留於北京。此時長澤的父親作為技師被派遣到奉天兵工廠，因著父親的朋友的關係，長澤得以住在大倉洋行在北京的辦事處。

購得《孔宅志》、《闕里述聞》、《南工廟祠祀典》等，以及關於北京掌故的書，還有一些清初刻本戲曲小說。在北新書店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店的分店買了些新書，因為這些書在東京見不到。他個人當時尚未涉足古書珍本，也沒有想到要買珍本。他為靜嘉堂所購書有：號稱是戴東原舊藏《明抄本授經圖》二十冊四卷，五十五元；殿版《日講易經解義》八卷首一卷二十八冊，四十五元；抄本《滿州祭神祭天典禮》六卷六冊，六十元；內抄本《續通典考補》一冊、《續通志考補》三卷三冊（此書未曾刊行過），六十元，等等。所謂的戴東原舊藏本，後來細繹，發現其中之藏章怪怪的，且不見於他處，抄錄時間似也晚於其年代。這是長澤為自己當時古籍版本知識相對缺乏而交付的學費。

十月，祖父龜之助突然去世（六十七歲）。長澤規矩也也在北京停留不足兩

月，即從陸路急遽歸宅。但內心依然戀著北京的天空。昭和三年（1928）一月末，再赴北京。

從大一時參加一高的旅行團開始，他一生中共有七次赴中國。而從1927年到1932年，長澤規矩也每年都去北京，時間大都在二個月以上。

在北京期間，長澤規矩也主要為三菱的靜嘉堂文庫買書，同時也幫大倉洋行鑑定書籍。大倉家在大正六年（1917）買入了董康誦芬室的舊藏，正熱心於中國古籍善本的購買，所以委託長澤代為鑒定殿版和宋版；¹¹ 靜嘉堂則在得到陸心源的藏書後，有意以收書全備為目標，並不以貴重書為主要對象，所以長澤主要從書目、叢書等類中，選購《四庫全書》收錄而文庫未入藏的書籍。為避嫌，長澤個人只購買文庫不收的圖書。他為文庫所買多為大價碼的書，但不像中國的圖書館工作人員那樣收取回扣（當時行規，一般收取十分之一的回扣），所以大受書店的歡迎。這樣，以三菱、大倉為目標，在長澤身邊，北京的書賈附集如蟻，常常一早就被吵醒。

昭和三年（1928），長澤在正月末從東京出發赴北京，五月末因張作霖事件影響，受勸歸國，期間有整整四個月滯留北京，一步也未出城外，每日以訪書兼聽戲度日。他從天橋請了百姓旗人胡琴師，上午到住處來教琴。又請人教唱，學習時調、大鼓、京調、崑曲的唱法。加入了所謂戲迷的行列。當年長澤向白師傅詢問雜耍館演出內容的交談記錄，被精心保存了下來，成為瞭解當時演出狀況的難得資料。學唱時師傅為他草草書寫的曲譜，也完整地保存着，從中可見長澤學唱時的認真細心。長澤所學的唱段，有皮簧《黃金台》、《托兆碰碑》、《捉放曹》、《武家坡》、《三娘教子》、《文昭關》、《硃砂痣》、《四郎探母》、《烏龍院》、《空城記》，吹腔《小放牛》、《探親家》等，他學的主要是生與老生的唱段。¹²

長澤熱衷於戲曲小說，事出有因。他酒煙不沾。大學時，陪鹽谷溫吃飯，屢被訓斥：「不解酒味，能懂李白的詩嗎？專攻支那文學卻不能作詩！」長澤作文寫詩，私下請安井樸堂刪正，則又受樸堂的訓斥。樸堂知其無詩才，婉勸道，有寫詩的工夫，不如讀點書；寫詩，到晚年退隱之後也不遲。長澤年少氣盛，頗不

11 大倉家所得，今歸大倉文化財團之大倉集古館。編有《大倉文化財團漢籍善本目錄》。

12 以上資料今存關西大學之「長澤文庫」。係散葉，草草寫於195×275公釐的紙上，間有長澤所作鉛筆註解。此時長澤的語言尚未過關，收羅曲本無多，故須有人一一作示範。

服氣，因為鹽谷溫不懂唱戲，他便轉而學唱戲曲，希望通過學唱戲曲、寫戲曲，來出人頭地。同樣，他在大學二年級時（1924），入東京外語學校速成科蒙古語部（學制一年），也是想用鹽谷溫也不會的蒙古語來瞭解元曲語詞。從這裏可見長澤好勝的性格。

昭和二年（1927）秋，長澤規矩也在北京認識了馬廉。這對他的戲曲小說收藏具有重大影響。馬廉是北京大學教授，戲曲小說研究的專家，他的書齋名「不登大雅之堂」，以表示自己的趣味與傳統學者有所不同。又因得到明刊孤本《平妖傳》，而顏其居曰平妖堂。其時還因對三言二拍的研究，也受到日本學界之矚目。馬廉同時擔任孔德學校總務長，實際主持孔德學校的事務。早在1925年夏，馬廉為孔德學校從蒙古車王府購得數千冊詞曲小說。同年秋天，又為孔德學校購得清蒙古車王府舊藏之數千冊鈔本皮黃與俗曲曲本，次年請顧頡剛為這些曲本編目，載於《孔德月刊》第三、四期（1926年十二月、1927年一月），以故，「車王府曲本」之名遂喧傳一時。¹³

長澤規矩也是在車王府曲本名聲初起的時候認識馬廉的。結識馬廉後，長澤經常往來於北河沿的孔德學校。馬廉給他看個人及學校的藏書。長澤規矩也第一次目睹了車王府舊藏曲本，這引起了他對俗曲收藏的濃厚興趣。在此之前，他在北京所買的曲本，都是普通的刻本或活字排印本，¹⁴通過馬廉和孔德學校，長澤瞭解到清代專門代鈔書籍的書坊，並第一次見到了有名的「百本張」鈔本，此後，他便以極大的熱情搜羅戲曲與俗曲，尤以人所不取的鈔本曲本為目標。

次年，倉石武四郎以京都大學助教授的身份留學北京，也認識了馬廉，當是通過長澤介紹。兩人此前就蒙狩野直喜、鹽谷溫傳授過戲曲小說之研究，此時又加上馬廉的影響，因而十分熱心於戲曲小說的蒐集與研究。倉石曾用六十元買入明起鳳館刊本《西廂記》殘本（存上冊，今藏東洋文化研究所倉石文庫），令時人為之瞠目結舌。兩人一起收集明刻戲曲小說刊中的插圖，並借用馬廉、王孝慈和孔德學校之所藏，共同編輯成書，這就是在1980年才得以出版的《明清間繪入本圖錄》。¹⁵長澤規矩也與倉石武四郎兩人的友誼更直至晚年。倉石武四郎在鹽谷

13 參見拙文〈車王府藏曲本考〉。

14 從雙紅堂文庫現存藏品來看，長澤所購民國排印本唱本數量多達652冊。時至今日，也已是難得之物。見拙編〈雙紅堂文庫藏民初北京排印本唱本目錄〉。

15 參見長澤規矩也編，《明清間繪入本圖錄》。

溫退休後一度兼任東京大學教授，並在1949年後做東京大學專任教授，即是因長澤之力挺與周旋。轉至東京後，倉石也常常邀請當時兼任東大文學部講師的長澤規矩也為學生主講的討論課作講評。學生對長澤是既害怕又歡迎。害怕的是長澤目光如炬，其缺漏無可逃遁，動遭訓斥；歡迎的是長澤會帶他們看各種古籍善本，可以學到許多知識。而倉石與長澤，也被後人視為從東大中國文學科出來的最傑出的學生。倉石的藏書今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他系統地收羅了清人的經學著作，成為日本國內無以類比之蒐集。今觀兩人精魂所繫之書籍，在同一層書庫中比鄰而處，相互致意，不禁令人思緒悠悠。當然，這已是題外之話了。

長澤規矩也與在北京和東京兩地做古書生意的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相熟。他經常聽田中說，買書時若一味壓價的話，書商就不會讓你第一個看到好書。因此，長澤很少對書買壓價，通常只說「留下罷」，然後用紙記下書店名和書價，故意把此割與樣書留置案頭。送書的書買依次而來，在等待之中，似是不經意中看到書割，第二天就會帶來同一版本的書，但報以更便宜的價格，或者是帶來同一類書相探問。就這樣，長澤不僅得到了最低價格，而且能夠得到好書。由此可見長澤規矩也精明的一面。顯然從小就出入於古書店的歷練，使其與書買打交道時，完全是游刃有餘。這與倉石武二郎恰成鮮明的對比。

昭和三年（1928）一至五月在北京。這是長澤規矩也在中國居住時間最長的一次，也是他在中國得書最多的一年。他經手購入的書籍，總部數達三百四十九部之多。其中為靜嘉堂所購有：清鈔本《李侍郎經進通鑿博議》十卷四冊，一百六十元等；獲一批內抄本，其中之壓卷，是《欽定西清硯譜》零本三卷（卷二、一八、二十）三冊，墨淡如漆，描寫纖細，共花了四百五十元；明內抄本《北史》零卷（卷三三、三四）一冊，紅格抄本，六十元。得文瀾閣四庫全書本《湖山集》十卷六冊，有補寫，係《叢書舉要》之編者李之鼎的舊藏，當時在北京沒有學者認可其為四庫全書的零本。又從文奎堂見到滿漢文書籍之刊本、寫本近五十部，全部買下。其中花費最高的是滿文刊本《金瓶梅》一百回，四十二冊，二百元。為諸橋轍次博士購得袁世凱關係書（假題袁氏秘函）十四冊，一千元；《永樂大典》零本四冊，千三百元。等等。

這一年，長澤規矩也對北平已稍稍習慣，滯留時間也較長，開始感受到在小店或路邊小攤買小冊零本的樂趣。戲曲收購，也從普通本進到鈔本。在中華印刷局買了許多活版薄冊的唱本。還買了一套《選刊曲本》，即光緒六年版《梨園集

成》，共二十四冊，用了十二元。這是以往日本人從未買到過的二黃（早期京劇）的曲集。抄本曲本中，以明沈璟的《一種情》清鈔本等較為珍貴。又覓得內府抄本《鼎峙春秋》的零本一冊，得以略嘗「內抄本」之滋味。這是從保萃齋得到的。有見於此，機敏而狡黠的翰文齋的高姓店員又為長澤帶來百數十冊百本張的抄本唱本。而這類抄本唱本，長澤以前只見到馬廉（隅卿）和孔德學校有藏。所得除皮黃之外，還有鼓詞、扒山調、蓮花落、山東蓮花落、四平落子等。

昭和四年（1929）七至九月再赴北京。七月，松筠閣出售大批南府曲本及其他鈔本曲本，很多到了長澤的手中。其中有內府鈔本五十冊，用四至五角錢一冊買得。又有百本張的唱本目錄，百本張子弟書四種，以及高腔曲本等等。此外還有影戲的臺本和折子戲用的崑曲腳本等，數量很大。此事在北平的古書屋間廣為流傳。由於當時民國學人中還很少有人收藏這類曲本，書店店員紛紛說是他們店中也有鈔本曲本，爭先恐後地送到長澤的住處。而最多的部分，實是在文萃齋、東西牌樓和後門的露攤所買，其中有角本和身段譜，不亞於從松筠閣所獲。許多本子未見於劇目著錄，在得到傅惜華指導後，才得以分門別類。傅惜華能演崑曲。崑曲在清末以後已經很少上演，愛好者多在家中學習唱演，為此而鈔寫的附工尺的選段很多。所以長澤自己只留下了崑曲譜《雙官誥》和蔣韻蘭正本、三經堂鈔本（附身段），其他都送給了傅惜華。

高腔曲本令長澤深感興趣。因為這是青木正兒博士曾經跑到保定想聽而沒有聽到的。高腔在清代宮中是與崑曲互演的。長澤在北京有幸曾聆聽過二十幾次。但高腔曲本傳世甚少，其特點是曲詞的左側刻有小三角形的符號，從上方一條直線延下來，因而可以判明。他曾饒有興致地與傅惜華一起到各個書攤上去尋找高腔曲本。

長澤從文徵閣（即翰文齋高姓店員私開的店鋪）送來的晚清文藝齋鈔本中，選購了《桃花記》十二冊，《大明興隆》十冊，《回龍傳》十六冊，《銀盒走國》二十四冊。這是賣饅頭的蒸鍋鋪用來出租的本子。書衣上有「壹天一換」木記。他後來在東北大學狩野文庫中見到日本人租書及類似的冊子及印記，以為兩相比較，很有意思。

此外所得，還有快書的本子。

昭和四年（1929），長澤個人在北京所購買的書籍，除了《愛日精廬藏書志》

的木活字初印本等書目外，幾乎都是曲本。

是年十月初，長澤規矩也從北京歸國。十一日，在從一高歸宅的途中，見到村口書房的書目，有高崎藩大河內氏散出之書，其中戲曲小說之多，令人吃驚。立即趕去。但神山潤治等人先到，已經買下了《水滸》和奚疑齋的寫本等。所以，長澤只能在殘剩書籍中，選購了十種書籍，價錢不足一百日圓。其中有明崇禎刊孟稱舜的《二胥記》傳奇二卷三十齣、萬曆刊本陳繼儒評《風流十傳》八卷等三種孤本。這些戲曲小說類尚是廉價，因為長澤曾從文求堂購買孟稱舜的明崇禎刊本《新鐫節義鴛鴦塚嬌紅記》二卷，花了一百六十日圓；此本與宣德刊本《嬌紅記》，即「雙紅堂」之名的由來。

《二胥記》和《風流十傳》兩書，次年攜到北京保萃齋以金鑲玉重裝。¹⁶北京圖書館求得長澤規矩也的同意後，借《二胥記》以作影鈔。後來鄭振鐸編《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即是用這個影鈔本影印的。

在當時，長澤規矩也似與北京圖書館這樣的購書對手，保持著一種相互交流又相互防範的微妙的關係。中國方面對其從日本發掘出來的孤本佚存書深感興趣，又擔心精通版本的長澤規矩也會讓中國的好書流出域外。

時至1929年，長澤規矩也致力於收集戲曲與俗曲曲本已經有兩年多。當時，北京各圖書館以其不登大雅之堂而不屑於收藏。早在1925年，馬廉為孔德學校收購蒙古車王府舊藏「小說戲曲」，關注的其實仍是文人所作的傳奇戲曲與小說（兼及長篇的彈詞、鼓詞），且以刻本為主。此類書籍，因王國維、吳梅、魯迅等人的努力，實已漸登於大雅之堂。而車王府舊藏的鈔本皮黃曲本與俗曲唱本之類，則猶未入時人之法眼。所以，1925年夏天，當書賈以為馬廉會對所有的戲曲俗曲都喜歡而送來車王府舊藏鈔本曲本時，馬廉只是讓他們堆在地上，並沒有顯出熱情。事有湊巧，劉復剛從法國獲得博士學位學成歸來，借住於孔德學校。經常出入於馬廉的辦公室，因見地上堆放著一堆曲本，信手取來翻看，馬廉說：「你看看，有沒有價值。」劉復是北大歌謠徵集活動（1918年）的發起人，對民間曲本抱有濃厚興趣，所以極力稱讚是好東西，並說你不買我買。馬廉說：「既然是好東西，那就只能由公家來買。」這樣馬廉才替孔德學校買下。這五千餘冊鈔本曲

16 據奧野信太郎（1899-1968）的記錄，1937年前後在北京請人作書籍修補裝幀，價格不過是東京的幾分之一。見其《隨筆北京》，頁20。故長澤攜至北京請人重裝，也就不難理解。又，承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贈奧野此書，識此謹表感謝。

本，僅僅付了區區五十元錢，¹⁷ 在當時只不過是紙張的價錢。即便如此，這樣的購藏，時人猶以為非，以為「圖書館不應該有這類的收藏！」¹⁸ 這一事例，可以概見當時中國學術界之狀況。

在這樣的背景下，長澤規矩也收羅曲本，幾無競爭對手。書肆的店主們當然十分歡迎這位爽快的日本人，紛紛把本來要送去化紙漿的這類曲本，送到長澤的寓所。

長澤規矩也先後從北京琉璃廠的文澂閣、來熏閣、保萃齋、文萃齋等書肆得到了許多鈔本曲本。在傳奇戲曲之外，還得到了晚清的皮黃、高腔、崑曲、牌子曲、趕板、小岔、馬頭調、大鼓書、快書、子弟書等鈔本曲本甚夥。其中還有很多附有身段的內府鈔本。又在松筠閣購得養和堂、百松壽堂等家之鈔本，內有角本（只錄某一角色的唱詞）、八角鼓、影戲的唱本。而長澤於各書肆所見之舊鈔曲本，不論其品相，即是片紙亦不放過，幾可以席捲相形容。也以此之故，此類臄卷殘葉尚得以精心保存於世間，為吾人所見。慨嘆之餘，亦令人心存感激。

在當時，一個日本人，竟然這般大規模地收購中國俗曲唱本，顯然大大刺激了中國學界，使情況一時為之大變。¹⁹ 長澤說：「松筠閣多劇本。特別是昭和四年還有許多南府的劇本，由於尚未受到北京學界的關注而容易入手。但由於此後受到批評，所以民國方面也踴躍購買，翌年就不能得手了。」²⁰

不僅如此，昭和五年（1930）七月至九月長澤再次西行時，他已經成為中國方面嚴加防範的對象。

17 劉復在《中國俗曲總目稿·序》中記述了這段對話。

18 馬廉述及這批曲本收藏經過時曾說：「這一批曲本，是14年的暑假之前，買蒙古車王府大宗小說戲曲時附帶得來的。通體雖是俗手抄錄，然而幾千百種聚在一起，一時亦不易搜羅；並且有許多種，據說現在已經失傳了。15年暑假中，承顧頡剛先生整理，編成分類目錄。最近因各方索閱者眾，爰在本月刊分兩期發表，雖然也不免有人要批評我們，說是：圖書館不應該有這類的收藏！但是索閱目錄的人們，也許是和我們表同情的吧？」見顧頡剛編《北京孔德學校圖書館所藏蒙古車王府曲本分類目錄》之識語（頁33）。

19 孔德學校在1925年秋只用了50元就買下數千冊車王府舊藏曲本，1927年初目錄全文刊出，1927年底顧頡剛遣人為中山大學轉抄得一部分曲本；1928年，劉復主持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系統收集俗曲唱本。由於學界的關注和長澤規矩也等人的收購，也刺激中國本土學者購藏，敏感的書賈遂以為奇貨可居。劉復說：「北平書賈的感覺，比世界上任何動物都敏銳！自此以後（原指車王府曲本發現及目錄公布問世之後），俗曲的價格，逐日飛漲：當初沒人過問的爛東西，現在都包在藍布包袱裏當寶貝，甚至於金鑲玉裝訂起來，小小一薄本要賣兩元三元。」長澤規矩也則從另一角度說到：「事實是善本日少，書價騰貴。美國人不問書而購，我邦人不顧內容而買，也是書價暴漲的原因之一。」《中華民國書林一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6，頁4。

20 《收書遍歷》，《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6，頁266。

在此之前，書賈也以三菱不買的宋元刊本持來讓長澤過目。其中有宋刊本《韓集舉正》，翰文齋的高姓夥計悄悄送到長澤的住處，要求長澤秘密買下。因為長澤也給大倉洋行作古籍鑑定，就推薦給了大倉洋行（此書今藏東京之大倉集古館）。另外，武田長兵衛在購入宋刊本《備急總效方》時，也曾請長澤作鑑定（此書今藏於大阪武田科學振興集團之杏雨書屋）。事後，中國方面有所風聞，民國圖書館界懼國之重寶流失，便把長澤規矩也作為重點關注的人物。

是年，長澤從松筠閣買得養和堂和百松壽堂記鈔本崑曲，和宮中演劇用的角本、演影戲的益勝班的底本，馬頭調、八角鼓等的抄本等等。益勝班的底本，有所買的《瓊林宴》同種的《東漢》八卷，首有「壬申年敬修堂」、「同治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建堂誤批」，故可斷定均為同治間之物。影戲的唱本甚少。馬頭調、八角鼓等則少有刊本。「但一年間，北京的學界得知我買了鈔本唱本，在我抵北京前即趕緊搜尋了一遍，所以得手就不如前一年那麼快樂了。」²¹

長澤從保古齋殷氏處買得萬曆版《玉簪記》一種。初問其值，答曰：五十五元。回以四十元，殷氏不售。求五十元，長澤不應。殷氏又云：若請徐森玉氏一覽，當不止此價。長澤遂以五十元攜回。後來才知道版本學家趙萬里曾有意此書，書賈為獲高價，賣給了長澤。故有傳言，謂長澤規矩也奪走趙萬里定下的書。購書而致的摩擦，也由此產生。

是年夏，長澤到南方訪書，北京圖書館專門派趙萬里予以監視。長澤說：「無論我是到杭州，還是去南京，或是宿蘇州，受館長之命的趙萬里君到處都圍著我轉。我很後悔把日程報給北京。這樣，到處的古書店都不讓我見到善本，全無收穫。」²²

但這也激起了長澤的好勝心，所以，他在蘇州發掘了稀見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綱目》和覆宋刻本《千金方》。前者存世不超過五部。在杭州，發現了文瀾閣《四庫全書》零本。

21 〈わが蒐書の歴史の一斑〉，《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6，頁171。按：1928至1929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間文藝組在劉復的主持下，著手進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對中國俗曲的大規模收集工作。兩年時間內收集了數萬冊曲本，成為中國俗曲的淵藪，這批曲本今藏於傅斯年圖書館。此項工作主要出於劉復的倡議，與長澤規矩也收藏曲本，正在同時。所以相互間爭搶有限的資源，並不奇怪。可以說，中國方面對長澤收藏曲本雖有防範之意，而未必真的針對其一人而來。請參前註。

22 〈思い出す人人（五）〉，《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6，頁349。

《本草綱目》之版本，長澤原來並不瞭解。恰好此前在文求堂，偶然聽到中尾博士向田中震二談到金陵小字本比之大字本傳世更少，所知傳本僅三、四部云云。事有湊巧，長澤隨後即到江南訪書，在蘇州護龍街的一家店裏，店頭第一列明明白白地擺著這部金陵小字本。而且標價僅十元。所以也沒討價，迫不及待地按標價買下了。回日本後告訴田中慶太郎，田中便以時價一百日圓的四朝本《十七史》向長澤交換。由於東京的學者對醫書無興趣，田中轉手賣給了美國人。

不僅如此，《本草綱目》的旁邊，還擺著日本覆宋刊本《千金方》，標價約是五十元。此書後來長澤通過東京的書店以一百日圓脫手。長澤說：「如果趙君不來監視，至少後者就不會買了。」²³

關於《四庫全書》零本，也有一段故事。昭和二年（1927）初，北京的來熏閣給靜嘉堂寄去文瀾閣四庫零本《嘉禾百詠》，但沒有文瀾閣的任何印記，難以辨別真偽。長澤規矩也請日本著名漢學家市村瓚次郎博士鑑定，說不是原本。昭和三年（1928），再請教北京的版本專家徐森玉氏，因徐氏沒見過南三閣之本，也不能判定。長澤規矩也受託為靜嘉堂購書，一般稀見之本，儘管他自己買得起，也都給了靜嘉堂。這一部《嘉禾百詠》，因為無法判別真偽，來熏閣又催得很急，不得已，長澤寄去二十元，自己攬下了。他在昭和五年（1930）訪問杭州，目的之一，即是調查文瀾閣四庫零本的真偽。經調查發現，文瀾閣之書，與北方四閣的大型本不同，開本較小，用紙也較差，與北方本之精美不可同日而語。僅卷首有「古稀天子之寶」、末有「乾隆御覽之寶」印記，而均未鈐「文瀾閣印」。此種文瀾閣零本，係太平天國亂時散出，雖因亂離而稍有汙損，書衣已不存，但毫無疑問是文瀾閣的原本。只是北京的學者和商人，以及近在身邊的杭州書肆，均不知其為原本。日本學者更無從知曉。所以長澤實是無心中揀到了寶貝。而令長澤規矩也更為驚喜的是，調查歸來，甫一入城，就在抱經堂書店看到了十餘冊文瀾閣本，整整齊齊地擺放在顯眼的位置，而且書衣還保持原樣，幾乎未動。一問店主人，顯然不知是文瀾閣的原本，一冊要價不足二十元。但長澤只是為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買了《竹嶼山房雜部》一冊（存卷十四至二十二，今存東洋文化研究所），又作為給服部宇之吉博士的禮物，買了《墨客揮犀》一冊（存卷一至五），其餘都留在店裏了。後來，他仍把先前所得的那一冊四庫零

23 同上註。

本給了靜嘉堂。

在監視之中，仍能得到如此珍籍，令長澤大感到得意。長澤說：「因為我不忍全部買走。同樣的例子在北京也有。」²⁴ 這是指二年前在北京，他一面驚喜於所獲得珍貴的內府鈔本，隨後卻將其中大半贈送給了北京的滿族學者傅惜華。

順帶一說，當時年方弱冠的傅惜華（1906-1974），小於長澤四歲，喜愛戲曲，能演崑劇。時年方二十一、二，當是與長澤的交往，激發了他收藏戲曲與俗曲的熱忱，傅氏的碧蕖館後來成為收藏戲曲與俗曲的最為豐富的書齋之一（今歸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傅惜華本人則以戲曲俗曲的目錄學專家而知聞於世。所著有《元人雜劇全目》、《明代雜劇全目》、《清代雜劇全目》、《明代傳奇全目》、《子弟書總目》、《北京傳統曲藝綜錄》等（另編有《清代傳奇全目》，「文革」中失去不存），於中國俗文學研究，厥功至偉。但也因為他與兄傅芸子跟日本學者關係密切，二戰結束之後，處境甚是尷尬。

長澤此次赴江南訪書，在南京幾無所得，但在蘇州，從覺民書社買到帶譜的崑曲曲本十八冊。多為宣統間所書寫，是一位名叫「陳湘記」的人鈔錄的（按：今文庫分類目錄誤作「陳湘」鈔錄，非是）。又經張元濟氏的介紹得觀潘、許兩家的藏書。並受到吳梅的接待，得觀其所藏戲曲；吳梅為戲曲研究之大家，長澤向盼得睹其風采，故頗覺愉快。

在上海的中國書店，買到了《續離騷》初刻本。當時長澤並不知其價值，實是因店員的勸說而買下，不意先鄭振鐸一步而得手。鄭振鐸隨後特地來信求其照片，以便收入所編《清人雜劇》，長澤則慨然借給了原本。

在北京，翰文齋的高姓夥計給長澤帶來了三朝八行本《禮記正義》和南宋刊本《重校添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零本各二冊，說也許是內閣大庫本。長澤為東方文化學院各納了一本，自己手邊也各留了一本。又買了清刊本滿文《三國志》二十四冊（一百二十元）及其他。

從北京的私人手中，購得四庫零本《三魚堂四書大全》（卷一及卷首）一冊。據說這原是殘本，全部十冊需三千元。書衣有「文淵閣寶」之印，顯為文淵

24 〈わが蒐書の歴史の一斑〉，《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6，頁171。按：長澤在〈收書遍歷〉中則略表遺憾地說：「今天看來，要是把看到的全部買下就好了。」見《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6，頁260。

閣本，而非偽造。但《三魚堂四書大全》並未收入四庫，而僅見於存目內，未免令人生疑。長澤的判斷是：此書初擬收入，後被剔出。他為靜嘉堂文庫買下此書，是覺得可作為樣本，以便將南方三閣的小型本與北方四閣的大型本作比較。此冊最薄，故報以全書十分之一的價格而成交。不意，第二年，北平圖書館袁同禮副館長專程邀請一晤，長澤規矩也赫然便見其餘九冊出現在袁氏桌上。袁館長先是以與長澤先前同樣的疑問，詢之長澤。長澤即席侃侃作答。袁氏又再三對此書第一冊之缺失，表示不可思議，長澤訥訥然未敢回應，大是困窘。

昭和六年（1931）七至九月，第六次赴中國，所得似甚少。僅是夏日，在杭州抱經堂用七十元買得延享版《一切經音義》五十五冊，稍可一說。是年刊出了他所寫的〈中華民國書林一瞥〉，細緻介紹了北京及江南各地書肆的情況，成為後人瞭解1920年代末中國舊書業的重要參考資料。可以說，當時沒有任何學者能夠像長澤規矩也這般熱心去瞭解這個市場。

昭和七年（1932）八月的中國之行，是長澤最後一次到中國。這次他主要不是為了訪書，而是因服部宇之吉博士的推薦，作為伊藤述史隨行人員，出差中國。²⁵此行也意外地買到了一些唱本。二黃、大鼓書之外，還有百本張的牌子曲、趕板、小岔、馬頭調和快書的唱本。子弟書的本子，得到了百本張和老聚卷堂的。但此外幾無所得。因為與以往租用私宅不同，這次是住在北京飯店，那畢竟不是一般書賈可以出入的地方，而且，這也是長澤在大學畢業之後，在北京的滯留時間最短的一次。

是年刊出了他所寫的〈中華民國書林一瞥補正〉，僅僅一年之間，各地舊書業之凋弊，已是令人震驚。

昭和七年（1932）歲末，日本書誌學會成立。初期會員限善本收藏家六人、圖書寮等善本收藏圖書館關係者十四名，共二十人。長澤規矩也與川瀨一馬是其運作的中心人物。昭和八年（1933）一月，創辦《書誌學》雜誌。七月，因患神經衰弱症，轉箱根療養。十月，結婚。

此後，長澤規矩也因為對小說戲曲方面的興趣轉淡，沒有再往中國。其性格

25 長澤自記作為伊藤之隨行人員，陪同出入於花柳之地，且需就相關的行事作翻譯與安排，令他這樣只關心古籍而無此經驗的人，頗受困窘，幸而得田中慶太郎的幫助，遂得以完成工作。而筆者聞之嘗受教於長澤之日本學者，則或另一角度而作註解，以為長澤當年在中國之瀟灑生活，非今之學者可及。兩相對比，亦堪玩味。

中易冷易熱的一面，或許起了重要的作用。²⁶ 例如他最初獲任第一高等學校教授，但他並沒有太在意這個教職。昭和九年（1934）更辭去第一高等學校的教授職位，以便集中精力編纂辭典。不過，此後他在國內也收購了不少從日本舊家散出的小說、戲曲與俗曲。如昭和七年（1932）十月，從琳琅閣得到明崇禎刊本《石渠閣精訂皇明英烈傳》。早稻田大學講授哲學的千葉菊香的千葉文庫散出，長澤通過大屋書房購得明存仁堂刊本《新鐫國朝名公神斷李卓吾詳情公案》、清草間堂刊本《草間居新編五鳳吟》、明汲古閣刊本《水滸記》（全卷附和譯）、寫本《清君錦先生水滸傳批評解》、《人間樂》、《四巧說》等。又從淺倉屋得到了明崇禎中劉興我刊本《新刻全像水滸傳》，是為孤本。

昭和八年（1933）九月，僅用一日圓錢，便從岩松堂購得《新鐫時尚樂府千家合錦》、《新編時尚樂府新聲》、《新鐫南北時尚絲弦小曲》、《新編說唱孫行者大鬧天宮》四小冊。

十年（1935）四月，從京都竹苞樓買了《新鐫批評桃花影》。

後因《新編和漢辭典》出版（1937），手段稍寬，購書遂多。十三年（1938）九月，山本悌二郎氏舊藏散出，通過各誠心堂、山本書店，購得的清乾隆刊本《書隱叢說》、明萬曆刊本《唐伯虎先生外編》、清刊本《俚言解》、《雙忠廟傳奇》等。

十四年（1939）一月，從淺倉屋得寫本《杏花天》，是中川忠英的舊藏。三月，通過山本書店，以高價購得富見閣文庫舊藏之明天啓刊本《歷代史略詞話》及明萬曆刊本《新編陳眉公先生評點春秋列國志傳》。五月，得明萬曆刊本《鼎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九月，千葉文庫之書散出，從南陽堂購得明萬曆癸卯佳麗書林刊本《新刻全像音註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六卷一百回和明刊巾箱本《賽徵歌集》，新鈔本《新刊鬱輪袍雜劇》、《新刊杜祁公看傀儡雜劇》、《新刊葫蘆先生雜劇》（按：當是據內閣文庫藏萬曆刊本影鈔，其中《葫蘆先生》為僅存於世的孤本刊本）、清刊本《韓湘子十二度韓文公藍關記》等。

十五年（1940）八月，從一誠堂的陳列室獲得明萬曆《新刊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二卷的卷下，孤本；而同書的上卷，兩年後，十七年（1942）一月在文雅

26 長澤性格之此一面，據其嗣子長澤孝三所撰之傳文。見江上波夫主編《東洋學の系譜》第2輯，頁237。

堂得見，遂成完璧。這是非常罕見的機緣。同年六月，從山本書店購買了明萬曆中潭陽劉慶襲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西廂記》。

但持久的戰爭，隨後也影響到了長澤規矩也的生活。《新撰和漢辭典》的版稅，是他的購書的主要資源。在二戰後期美軍對東京的大空襲中，《新撰和漢辭典》的版塊和清稿均被焚毀，用金陵小字本《本草綱目》換來的三朝本《十七史》，也連同他的住宅一起化為灰燼。有懼於此，他把1927年第一次赴中國訪書時所購買的與孔子祭祀相關的書籍，售給了當時的帝國圖書館（今國立國會圖書館）。在日本戰敗前後，面對大批散出的珍貴古籍，長澤只能作為旁觀者摩挲歎息。

不僅如此，長澤很快也加入到散書者的行列。為購置新宅，他於1951年將所藏戲曲小說出售給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舊藏有插圖的珍貴版本，為求善價，大多售給了村口書店，後來為京都大學文學部所得。²⁷ 兩種附有精美插圖的《嬌紅記》戲曲及一種《雙紅傳》小說，也係這一原因而沒有進入東洋文化研究所。

27 長澤規矩也舊藏的一部分帶圖之戲曲小說珍本，今歸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筆者請在京都大學訪問的博士生全婉澄代為查核，據該館之「圖書受入簿」，知該館於1955年2月28日以「吉川機關研究費」，購得一批圖書，總計21部，179冊，共付51.5萬日圓。故知決定者實為吉川幸次郎。今可確考出於長澤之舊藏者，有：《新刻全像音註徵播奏捷傳通俗演義》6冊，2.5萬日圓；《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2冊，6.5萬日圓；《新刻出像音注唐韋臬玉環記》4冊，4萬日圓；《重校錦箋記》2冊，3.5萬日圓；《新鐫節義鴛鴦塚嬌紅記》6冊，3萬日圓；《賽徵歌集》6冊，5千日圓。這當非長澤規矩也所售之價，而應是該館從村口書店購買時的價格。雙紅堂文庫得以命名的兩種「嬌紅記」均歸於此。是則京都大學有「雙紅堂」得以命名之表，而東京大學得雙紅堂舊藏圖書之實。又，此數種中，宣德刊本《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1928年已有鹽谷溫的影印本；《新鐫節義鴛鴦塚嬌紅記》，鄭振鐸所編《古本戲曲叢刊》2集已據同一版本影印。《玉簪記》、《玉環記》兩種，今已收入《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1輯。又校核長澤30年代所刊之目錄，知尚有部分鈔本曲本並未歸入東洋文化研究所。筆者在2007年10月間訪問東京，託田仲一成先生代詢長澤孝三氏，知長澤規矩也遺存之3萬餘冊圖書，今均歸關西大學。筆者於2008年2月間在京都訪書，蒙井上泰山教授接洽訪問關西大學，從所設「長澤文庫」檢得所藏之俗曲曲本，尚有：百本張鈔本《義俠記》30回3冊，文藝齋鈔本《大明興隆》鼓詞10冊，百本張鈔本《蝴蝶夢子弟書》4回4冊，百本張鈔本《點化》1冊，咸豐四年鈔本《戲本七齣》（揆童、聞鈴、乍冰、幻化、清宮收養、遙祭、分宮），清道光八年鈔本《王元福曲本》（角本），同治中樂班鈔本《斷橋、合蚌、打虎、犯相》2冊，原題《內鈔本十三冊》（附工尺）中之《探莊射燈》1冊（東洋文化研究所藏今改題《內鈔本十二冊》），清芬堂鈔本《拾畫、叫畫》（附工尺），《請清兵快書》1冊，《盆·目錄》鈔本1冊，渭水河、黃金台、文昭關、馬鞍山、定軍山、捉放曹、空城記、洪羊洞、武家坡、托兆碰碑、盜袞袞、探親家、三娘教子、硃砂痣、四郎探母、趕齋遇僧、烏龍院、瓦橋關、小放牛等鈔本皮黃劇本各1冊，以及清刊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清刊第七才子書《琵琶記》，臧晉叔改本《還魂記》，《六十種曲》零本《水滸記》、《灌園記》，清代翻刻本《目連救母》，日本新鈔本《新刊鬱輪袍雜劇》、《新刊杜祁公看傀儡雜劇》、《新刊葫蘆先生雜劇》等。前列鈔本部分當是長澤規矩也留作書誌學研究的樣本，實為所藏曲本中的白眉，如今匯入以書目類圖書見長的「長澤文庫」，尚未為世人所知。此中如石派書《義俠記》、《大明興隆》極為罕見，疑是孤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所藏戲曲及俗曲，經筆者斡旋，將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關西大學所藏部分，筆者正在努力，以圖一併公諸於世。

而它們原是長澤之書齋命名為「雙紅堂」的依據。從此，不僅雙紅堂文庫不再屬於其主人，而且文庫也已經不再擁有用以命名的戲曲與小說，不免令人感傷。

中篇、雙紅堂文庫所藏雜劇與傳奇

雙紅堂文庫所藏戲曲之豐富，從《雙紅堂文庫分類目錄》已可概見。但所藏版本之內容、價值究竟若何，則向未見著專文論述。故本文不揣淺陋，為之略述大要。

元明清的雜劇，近人最為關注，收羅殆盡，故要有新的發現，殊為困難。雙紅堂所藏雜劇八種，有三種值得一說。

（一）明尊生館刊《西廂記》

館藏目錄如是著錄。按，此本實為明萬曆間尊生館刊巾箱本《西廂記》之附刻，首頁題《會真記詩詞跋序辯證年譜附後》，巾箱本，書版高寬184×110公釐，內框高142公釐。半葉七行十六字，四周單邊，刻印皆精。凡一百葉，不間斷，藏者自第五十二葉以下斷開，析作二冊。首冊封底有題：「貳冊之內 藤原賴亮文庫」。封二有長澤氏的日文題跋，略謂：「此書書皮書有『貳冊之內』，但原應係《西廂記》的附錄，從卷首第一行末『附後』二字可知。尊生館校刊本《琵琶記》往年曾在北平見過，亦為巾箱本。《西廂記》，未見其書，應予珍藏。」此書為日本舊家散出之物，僅存者為原刊本之附錄，而實未見正文。附錄含唐元稹的《會真記》；唐、宋、元、明人所題詩或跋，始於元稹《古豔詩二首》，至張楷《蒲東珠玉詩》、祝允明《題崔鶯鶯真》而迄；末附《元微之年譜》。尊生館刊《琵琶記》北京圖書館有藏，而《西廂記》則僅存此一殘帙，亦彌足珍貴。

（二）明末刻本《鴛鴦夢》

此劇一卷四齣，明葉小紉撰，明崇禎九年（1636）沈君庸序刊本。半葉九行二十字，四周單邊。書版高寬267×170公釐，框高206公釐。此劇後有長沙葉氏覆刻本，遂較易見。對研究女性作家之創作，尤有價值。

（三）清初刊本《續離騷》

清嵇永仁撰，清初刊本，九行十九字，左右雙邊，大黑口，一冊，版高寬272×175公釐，內框高171公釐。鄭振鐸《清人雜劇初集》即據此本影印。扉頁有長澤日文題跋，略謂：「購於中國書店。鄭西諦氏求借印，以此郵寄，收入《清人雜劇初集》。傳本甚稀。」

雙紅堂文庫所藏明清傳奇戲曲三十餘種，除數種為民國覆刻、石印、排印本外，其他均屬明清刻本、鈔本，內多為稀見之什，殊為珍貴，今擇要予以介紹。其中明末刊《重補摘錦潮調金花女附蘇六娘》，係世間孤本，廣東人民出版社所印《明本潮州戲文五種》（1985）已收錄，學者多有論考，茲不贅。

（一）清鈔本《一種情》

此戲原名《墜釵記》，明沈璟撰。今知中國本土存有二種清鈔本：清順治七年（1650）鈔本《墜釵記》，傅惜華舊藏，今歸中國藝術研究院；姚華舊藏清康熙鈔本《一種情》，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據以影印。姚華曾據所藏康熙鈔本作過錄，這一過錄本今歸北京大學，《不登大雅文庫藏珍本戲曲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據以收錄；唯刊者謂據姚藏清鈔本影印，則不確。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著錄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同治間瑞鶴山房鈔本一種，²⁸但瑞鶴山房鈔本《一種情》僅選錄〈冥勘〉、〈上墳〉、〈拾釵〉、〈舟逃〉、〈周廟〉五齣，當列入選本，而不宜作為獨立版本著錄。

此本是長澤在1928年於北京購得。書衣封簽作「一種情」，題下小字四行：「炳靈公，一出；周王廟，一出。」正文標作「某齣」，但無齣目。高寬242×135公釐，葉心200×110公釐，半葉九行二十二字，白文小字雙行，紅筆句讀。

《雙紅堂文庫分類目錄》著錄此劇，謂：「三十出，第十九～二十二缺，明沈璟。清寫。」核正文標目，十八齣以下所見齣目，已標作第二十三齣，故長澤以為「十九～二十二缺」。

該本主體部分為恭楷抄錄，當係文士過錄本。但細觀十四齣以下至第十八齣共五齣，係用藝人原抄本拼合。由於此本前半與後半係文士恭楷重抄，中間雜以藝人原本，又未改題藝人抄錄部分之齣目序次，粗看缺失甚多，實際情況並非如

28 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頁206。

此。其中由藝人抄錄的五齣，墨色較舊，書法較差，多未加紅筆句讀，間有改筆。又，「齣」，藝人原抄部分作「出」，過錄部分作「齣」。姚華舊藏本則均作「出」。

精鈔部分至第十五齣之前半部分，至「老爹請坐之。待我行前一一說」句，此下則拼接藝人原抄本，紙色略舊；原抄本自十三齣末句及下場詩始，故十四齣整齣重齣。

又，此原抄本第十五齣的內容，實同姚藏本第十六齣〈投僕〉。姚藏本十五齣〈猜遁〉，原抄本在第十六齣，即兩齣序次倒換。

細觀此原抄本亦出二人之手。第十四齣（〈舟遁〉）及第十五齣（〈投僕〉）之半面，墨色稍淡，不僅與再抄本之前十四齣字體迥別，且紙質更舊，實為最早之原抄本；第十五齣（〈投僕〉，相當於姚藏本第十六齣）後半以下至十八齣前半，墨色稍新，字體稍別，略見老成；十八齣之後半出缺，以下直接連接之第二十二齣，字體紙色複同前十四齣，為最後補抄者。以故，中間十九至二十一齣有脫文。

姚藏本第十七齣〈遊廟〉、十八齣〈魂釋〉，雙紅堂本合做第十七齣。第十九齣〈慶病〉、二十齣〈盧仙〉，雙紅堂本無。而直接連姚藏本之第二十齣〈盧仙〉，因前二齣合為一齣，故題為第十八齣。然僅存大半面。姚藏本第二十二齣〈別僕〉，雙紅堂本此以下屬補鈔，齣數之序次又同姚藏本。蓋在新抄錄、抄配時，保留了舊抄本一部分紙頁，以致前文有重齣；而此處又因裝訂時失當，以為重齣而多去掉一頁或二頁，致前後不能銜接，造成脫文。

比較姚藏本，則雙紅堂本二十二齣（〈別僕〉）並不缺；所缺者僅「第二十二齣」之目而已；故雙紅堂本實無姚藏本之第十九齣〈慶病〉，二十一齣〈痛歸〉，脫去姚藏本二十齣〈盧仙〉之後半。

此本多用蘇白，可知經過清代藝人的較多改動，但仍具參校價值。徐朔方師整理《沈璟集》時，未能見到傅氏舊藏本，僅據姚華舊藏本校訂。筆者嘗據雙紅堂本參校，發現多處失校，原出校語亦間有可議者。雙紅堂藏清鈔本之版本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二）清初刊本《二胥記》

此書為孟稱舜所撰。凡二卷三十齣。據序，此戲成於崇禎癸未（1643）春

日，次年（崇禎十七年，亦即順治元年）刊刻問世。

此係世間孤本。今所見為金鑲玉裝，二冊，重裝高寬297×181公釐，原高269公釐，框郭205×145公釐。四周單邊，九行二十字，書眉鐫評。後印本。卷首有長澤氏中文識語：「《二胥記》二卷一套兩本 明末孟稱舜撰，明崇禎刊本，大河內家舊藏書之一，天下孤本也。北京圖書館所藏本，尚從是本出。孟有《鴛鴦塚》、《貞文記》。《鴛鴦塚》傳本間有；《貞文記》一書，往歲鹿田松雲堂出售，久保天隨獲之，以歸臺北帝大藏。」此書為高崎藩大河內氏之舊藏，長澤於昭和四年（1929）十月從村口書店購得，後請北京保萃齋以金鑲玉重裝，北京圖書館以其屬於孤本，藉以影鈔。後來鄭振鐸編《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即據影鈔本影印。據比對，影鈔本有數字誤鈔。²⁹

久保天隨（1875-1934），名得二，1927年以《西廂記研究》獲頒文學博士學位，於戲曲小說研究頗有心得。曾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歿後，包括《貞文記》在內的主要藏書歸臺北帝國大學，今見於臺灣大學圖書館「久保文庫」。董康曾在日本見過久保所藏戲曲，《書舶庸譚》卷三（1927年三月十五日）有記錄。《貞文記》另有北京圖書館藏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據以影印。據影印本，此戲敘浙江松陽張玉娘事，卷首有自撰題詞，所署時間為崇禎十七年（1644）。後人尋得祁彪佳一文，實為此劇卷首之序文。徐朔方師考孟氏得知張玉娘事，在順治八年任職松陽之後，孟氏籌畫為之立祠、撰祭文，在順治十三年（1656），故考定此書必撰於十三年或以後。³⁰鄧長風氏嘗先後撰作三文，不同意徐文意見，以為孟氏初撰，可能在崇禎之末，或即久保藏本；今所見《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之《貞文記》，或係後出之又一刻本；又誤讀董康氏之筆記，以為久保天隨舊藏本內有陳老蓮批語，故與影印本不同，當可證明早在崇禎末已經撰成。後鄧氏通過友人得睹數頁序文，未見久保藏本全貌，但仍斷言徐說為誤。³¹

29 今人王漢民、周曉蘭氏整理《孟稱舜戲曲集》時，筆者曾贈予長澤藏原刊《二胥記》照片。但其書「前言」謂將兩本比勘後，影鈔本清晰，刊本時有模糊，雖刊本有數處可正影鈔本之訛，而整體上不及影鈔本。令人啞然。

30 徐朔方，〈論孟稱舜的戲曲創作〉。又〈孟稱舜行實繫年〉，收於《晚明曲家年譜》之浙江卷。

31 鄧長風，〈《書舶庸譚》中的戲曲史料二題·關於《貞文記》〉，撰於1995年，初刊於《蘇州科技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孟稱舜的生年及《蜆斗蓮樂府》的作者〉，撰於1996年；〈《孟子塞五種曲序》的真偽與《貞文記》傳奇寫作、刊刻的時間〉，撰於1998年，初刊於《鐵道師院學報》，1998年第5期。三文後收入《明清戲曲家考略三編》。按：董康謂「孟稱舜字子若，又作子塞，所撰雜劇已梓入《盛明雜劇》初、二集中，傳奇惟此記及余所藏《節義鴛鴦塚妓紅記》。是記演申純、王嬌娘事，前有明崇禎己卯仲春王業浩序，並陳老蓮繪嬌娘像四葉，每葉有子若

據筆者目驗，久保舊藏本《貞文記》，與叢刊本影印本實為同一版本，唯影印本之底本已脫封面、署祁彪佳撰之序。故《貞文記》實作於順治十三年，因懼違礙，遂假託於崇禎之末，以掩人耳目。祁氏之序，確係偽託。

徐師並據《二胥記》之內容，考定此劇亦必作於崇禎十七年以後。蓋改署創作時間以避害，乃孟氏之故技。故此種《二胥記》只能稱「題崇禎刻本」，原屬清初刻本無疑。

（三）順治刻本《花萼樓》傳奇

《花萼樓》傳奇，二卷，《今樂考證》卷十著錄，題有情癡撰。日本松澤老泉《彙刻書目外集》著錄有《傳奇四種》，此即其中之一。清順治十年癸巳（1653）亦園刊本。二冊，版高寬222×144公釐，框郭202×138公釐，十行二十四字，四周單邊，白口，版心下方鐫「亦園」二字。有長澤氏日文跋：「《彙刻書目外集》所錄《傳奇四種》之一。蓋傳奇四種並非原名。」屬世間孤本。

此戲卷首《自敘》題「順治癸巳重陽之夕姑射醉月主人題于鳩茲之得閑處」；《凡例》題「昭亭有情癡自識」；正文題「昭亭有情癡填詞」、「姑射醉月主人閱」。「自敘」與「自識」者、「閱」者既為同一人，故作者昭亭有情癡與閱者「姑射醉月主人」亦是同一人。

昭亭，在今安徽宣州市北敬亭山上。遺址今尚存。劇中主角亦曾到昭亭訪友弔古。鳩茲，《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為春秋時吳地，在今安徽蕪湖市東南。

此劇主人公韓名世，字弱侯，一字無倚，別號石岱。本貫晉姑射歷山人氏。其父名韓夢蘭，字晚生，號馥庵，舉萬曆壬辰（1592）進士，官至太守，與胞兄夢芝同榜。劇末下場詩謂「遺編本事非虛謬」，可知此劇據實事編寫，且寓作者身世，故不署本名。

作者特別強調萬曆壬辰進士兄弟同榜，顯是事出有因。查《四庫全書》所收

題詞，評點亦為老蓮手跡，與是記行款同，蓋同時鈔版也。」董康這段話，表述頗有不清。後一「是記」云云，原指《貞文記》與《嬌紅記》行款相同，同時鈔版；鄧氏誤理解作《貞文記》與《嬌紅記》一樣有陳老蓮之評點，且影印本作「張玉娘」，而董康作「張玉孃」，故以為久保藏本是與影印本不同的版本。

之《山西通志》卷六十九，萬曆二十年壬辰科翁正春榜，有景明、景昉，均為安邑人，景明官至太常寺少卿，景昉官至河南左布政使。又據同卷所錄，嘉靖三十七年（1558）戊午科鄉試有景東生，安邑人。萬曆四年（1576）丙子科鄉試，有景明，安邑人，東生三子，進士；景昉，安邑人，東生次子，進士。³²可知景昉、景明確為兄弟；昉為兄，明為弟。故此劇實以景明之子的故事為藍本而撰寫。甚且寓有作者本人之身世。

姑射山、歷山，明清時屬山西平陽府（今山西臨汾）；安邑，明清時屬平陽府解州。

故《花萼樓》傳奇的作者，山西平陽府人，清初寓居安徽蕪湖，號亦園，又號昭亭有情癡、姑射醉月主人，順治十年（1653）撰此劇於蕪湖。

昭亭有情癡之識語又謂：「繼此有《驪珠釧》、《柳葉箋》、《亦園雜劇》等出，或災梨棗，予罪何辭。詞壇君子，請按板以教。」則作者尚有《驪珠釧》、《柳葉箋》、《亦園雜劇》等多種戲曲，均未見清人戲曲目錄著錄，亦不見傳，今藉此劇而得知其名，亦可補曲史之闕。

亦園既能作劇，且在明清易代之際，尚有能自刻行世，對湯顯祖、阮大鍼之作甚為熟悉與推崇，看來亦非尋常之人。若能考得本名，於清初戲曲史，自當大有裨益。惜其究竟為何人，俟考。

（四）《鬧烏江》傳奇二卷（存上卷）

《鬧烏江》傳奇二卷，清朱寄林撰，順治七年（1650）田大奇序，田氏玉嘯堂刊本，存上卷一冊，卷下闕。版高寬223×147公釐，框郭195×133公釐，半葉九行二十字，四周單邊，欄上鐫評，版心下方刻「玉嘯堂」。此書亦為《彙刻書目外集》所題「傳奇四種」之一。

朱寄林，明崇禎至清順康間人。一名英，字樹聲，華亭（今上海松江）人，移居江寧（南京），家有玉嘯堂，生卒年不詳。朱英另有《倒鴛鴦》傳奇，亦為順治七年序玉嘯堂刊本，今收入《古本戲曲叢刊》第三集。兩劇實即同時刊行。

長澤所藏此本，其《家藏曲本目錄》（《書誌學》八卷三號，1937）已列，傳

32 此項係博士生關瑾華代為檢核而得。

芸子《白川集》之「東京觀書記」有簡介。傅氏當年即從長澤氏齋中見此書，在文中移錄本戲家門。

作序及評閱者田大奇，江右（今江西）人，字常卿，餘不詳。此劇上卷二十齣，內又閏第十五齣，故實為二十一齣。全劇或為四十二齣。

（五）牛頭山總綱（存上本）

《牛頭山總綱》，存上本十八齣。清鈔本。書版高寬235×128公釐，葉心210×110公釐。半葉九行三十字不等，無句讀。書簽處書「牛頭山·全本」。書衣右側有篆書兩行：「清李玉撰。玉字元玉，吳縣人。據《新傳奇品》，『李玉之詞如康衢走馬，操縱自如』云云。」目錄題「新錄牛頭山傳奇總綱卷之首」。

清初李玉撰有《牛頭山》傳奇。《新傳奇品》有錄；《傳奇彙考標目》、王國維《曲錄》亦謂李玉作。李玉之《牛頭山》傳奇，今存丹徒嚴氏藏舊抄本，《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據以影印，陳多等整理《李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據以標點。

而雙紅堂藏本題《牛頭山》，與嚴氏鈔本情節全異。雖然書名相同，取材相同，但並非一劇，也非同一作者。雙紅堂藏清鈔本《牛頭山》實與李玉無涉，為新發現的一部傳奇。其創作時間似早於李玉撰本；其情節與明代傳奇《東窗記》與《精忠記》的關係甚為密切。

雙紅堂藏本第二齣〈賞春〉略同於《精忠記》的第二齣〈賞春〉；第四齣〈慶壽〉略同《精忠記》的第三齣〈猾虜〉；第五齣〈回操〉源於《精忠記》的第四齣〈應詔〉；第六齣〈裁衣〉與《精忠記》的第五齣〈爭裁〉相似；第七齣〈拜別〉出自《精忠記》的第六齣〈餞別〉；第八齣〈打圍〉與《精忠記》雖無直接明顯的對應之處，但該齣中兩人插科打諢之語見於《精忠記》的第七齣〈驕虜〉；第十一齣〈祭旗〉與《精忠記》的第八齣〈勝敵〉中前半相近；第十三齣〈指路〉出自《精忠記》第十齣〈叩馬〉；第十四齣〈解糧〉情節在《精忠記》第八齣〈勝敵〉提及；第十五齣〈出首〉中哈迷赤送蠟書、秦檜與王氏設計的情節與《精忠記》的第十一齣〈蠟書〉類似；第十六齣〈問課〉與《精忠記》的第十三齣〈兆夢〉相近。第十七齣〈班師〉出自《精忠記》的第十二齣〈班師〉；第十八齣〈金山〉與《精忠記》的第十四齣〈說偈〉相近。即雙紅堂藏本現存十八齣中，有十

三齣可以在《精忠記》中發現相應的內容。而文詞方面，明顯可見相襲之跡。

但雙紅堂藏本《牛頭山》偶爾也借鑑了《東窗記》。如《東窗記》第十四齣下場詩：「問來卦象用心堅，母親不必淚漣漣。全家若得身無事，燒柱明香謝上天」，即雙紅堂藏本《牛頭山》第十六齣〈問課〉下場詩「問求卦象使心牽。勸娘不必淚漣漣。闔家若得身無事。滿捧明香答謝天」之來源；《精忠記》無此四句。因雙紅堂藏本《牛頭山》刪去了道士作齋這段情節，所以《精忠記》第十三齣〈兆夢〉之下場詩不適用，遂據《東窗記》問卦之下場詩稍加改動而得。

所以，雙紅堂藏本《牛頭山》應是據《精忠記》改編重寫的一本傳奇，僅存上冊，相當於《精忠記》的前十四齣。

雙紅堂藏本《牛頭山》，前半襲自《精忠記》，但它並非《精忠記》改刪後的別本。書衣題《牛頭山》，而正文過半，仍未切入牛頭山事；第一齣開宗，亦僅改刪岳飛《滿江紅》詞而已，看不出與大戰牛頭山事有無關涉，可能它原本另有名字，並且屬於明人傳奇。

據曲目文獻，與《精忠記》相關的明人傳奇尚有《金牌記》和《陰抉記》兩種。

《金牌記》，《遠山堂曲品》著錄，有評：「《精忠》簡潔有古色，而詳核終推此本。且其聯貫得法。武穆事功，發揮殆盡。」³³ 則此劇當推崇岳飛事功，與雙紅堂藏本《牛頭山》無涉。

《陰抉記》，最早見於《遠山堂曲品》著錄，列於具品內，題：「陰抉 □□□青霞仙客」，《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有校記說：「據《舶載書目》有『新編神全菽雷岳電執仇武穆陰抉東窗記』，疑是此劇。『陰抉』恐是『陰報』之訛。」³⁴ 傅氏《明代傳奇全目》頁四二五、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頁一一〇二，均據《遠山堂曲品》。《中國曲學大辭典》頁四二二「東窗記」條引《舶載書目》，「執仇」校正作「報仇」；又謂「陰抉者，陰決也」，亦取《遠山堂曲品》之說。

按：《舶載書目》著錄作：「新鑄神全菽雷岳電役（復）仇武穆陰報東窗記上下 青霞」。《分類舶載書目》簡錄作：「岳雷岳電復仇武穆陰報東窗記 二

33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六），頁74。

34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六），頁91，133。

卷」，未題撰人，可據以改正《舶載書目》的訛字。³⁵《舶載書目》及《分類舶載書目》中，「陰報」二字清晰無訛，故此記應簡題作「陰報記」或「東窗記」。

《遠山堂曲品》評《陰挾（報）記》：「前半與《精忠》同。後半稍加改攙，便削原本之色。不識音律者，誤人一至於此！」³⁶

前文已舉雙紅堂藏本《牛頭山》十八齣中有十三齣從《精忠記》前半改編而來。從情節上看，岳夫人之夢，道月和尚提醒岳飛的情節，當為後半本可能出現「陰報」內容之鋪墊。參照祁彪佳的評語，疑雙紅堂藏本《牛頭山》源出青霞仙客的《陰報記》，為《陰報記》之清代演出本。姑識於此，俟考。

（六）清鈔本《紫府得道遙京院（玉龍球）》

此為清養和堂鈔本。存二冊。重裝248×144公釐，原高238公釐，葉心205×105公釐，半葉八行，行二十六字左右。分出（不作「齣」）。第十出〈刺歸〉、第拾出〈計逃〉序號重出，故末出雖標作「二十六出擺陣」，而實存二十七出。而故事尚未完結，故此戲原應有第三冊，全劇當在四十出左右，雙紅堂文庫所藏者猶是殘本。

此本書衣與內文均未題劇名。長澤規矩也據第一出末句「名題紫府得這瑤京院」，擬題作「紫府得道瑤京院（？）」，即將「這」校作「道」。但長澤最初著錄此書時，均於書名後加一問號（？），以示未定。如其《家藏舊鈔曲本目錄》³⁷即是如此。而東洋文化研究所後來編印《雙紅堂文庫分類目錄》時，卻將這問號「？」去掉了。

此戲演唐明皇時，富彥、富鳳（原草書寫作「凤」，即「鳳」）及銀瓶兄妹曲折之婚戀故事，穿插以楊國忠、安祿山、史彥明之爭鬥。以玉龍球為聘，銀瓶之姻事為一劇之關鍵。遵以傳奇之慣例，此劇原名當作「玉龍球」。

查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頁六二九，齊森華等主編之《中國曲學大辭典》頁五四六，均有《銀瓶牡丹》之目，謂一名《玉龍球》，無名氏作。唯

35 《宮內廳書陵部藏 舶載書目 附解題》，卷7，第4冊，頁6。又前書所附《分類舶載書目》「小說類」頁63。

36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六），頁91。

37 原載1935年《書誌學》4卷4號；又《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5，頁233-250。

人物作富麟、富鳳、史顏明，略有異，或係傳鈔時省寫與行草俗寫而致。唯兩書均未提及第一出之內容，似與雙紅堂本微有差別。《提要》之「銀瓶牡丹」所列版本有：（一）清鈔本，二冊。卷端題名《銀瓶牡丹》；（二）清鈔本，三冊，計四十三出。第一卷卷端題名為《玉龍球》，第二卷卷端為《銀瓶牡丹》。故雙紅堂藏本即為《玉龍球》之又一存世清鈔本，其淵源當同三冊四十三出本。別題《銀瓶牡丹》，當由兩女主角名姓來。銀瓶即富氏之女，則牡丹當指史玉琴。但今存各本史女既不名牡丹，疑因流傳過程中刪改之故。

《銀瓶牡丹》，《今樂考證》有著錄。

疑此劇原為明末無名氏所作傳奇，今本已經過清初藝人改動。

（七）清鈔本《紫瓊瑤》（殘）

此為清初張大復撰。存一冊，版高寬266×208公釐，葉心212×160公釐，十行二十字左右。存二十四出（不作「齣」），實未全。

此戲另存有兩種鈔本，一為康熙四十一年（1702）天喜堂忠良臣氏《抄正紫瓊瑤全目二卷》，北京圖書館藏，凡二卷二十六出，未有缺頁，《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據以影印；二為雍正八年（1730）唐子鈐錄本，傅惜華舊藏，今歸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資料室。

天喜堂鈔本凡二十六出，雙紅堂藏本為二十四出。看似有二出之差，其實二本相同。因為影印本的第十一出漏列，直接標作第十二出，即虛增一出；第二十一與第二十二出，雙紅堂本同屬第二十出。又據傳奇一般不用單數之例，故此本原應作二十四出為是。兩本均分出而無出目。未出兩本均僅存一面，後闕。唯影鈔本鈔錄較密，故所存實較雙紅堂本多數行。但影鈔本第十出某頁缺左下角，雙紅堂本無缺失。影鈔本鈔錄較為潦草，排列尤密；曲牌之間連書，每出之間僅作換行續鈔；字多俗體、省筆。雙紅堂本鈔錄較為工整，用字較規範，曲牌頂格鈔錄；出與出之間均換頁續鈔。就鈔錄情況而言，雙紅堂藏本實勝良臣氏鈔本。

兩本文字互有優劣。如第一出，影鈔本「帝德霞觴」，雙紅堂本作「帝德遐昌」；「民康」作「安康」，義較長；但「誘夫主」句，雙紅堂本無「誘」字；「推問」作「權問」，並無「救公勤王」四字，似又不及影鈔本。

要之，兩本鈔錄不精，時見訛誤；內中許多地方，若無另一本可校，則不可

句讀，或不可辨識。兩本互校，互相發明，可以整理出一個可讀的文本。

（八）清鈔本《正昭陽》

此為清石子斐撰。一冊，存上卷十五出（不作「齣」），版高寬241×130公釐，葉心204×113公釐。半葉十二行二十七字左右。

《正昭陽》全本僅存盧前舊藏雍正二年（1724）沈閏生鈔本一種，凡二十八出，現歸北京圖書館，《古本戲曲叢刊五集》據以影印。原本曲牌、科介處有紅筆圈點，影印本成黑色，間或難以辨識。

將沈本上冊與此本相比較，出目均同，文字異處甚少。兩本當出同源，僅鈔錄時偶有脫誤或鈔錄後間有改動。多有底本抄錄相同，而後塗改者亦相同的情況。可證兩者來自同一底本。由於沈本間有訛誤，故而得此殘存上冊，可為此劇增加一個重要的校本。

總體而言，沈氏鈔本相對較為工整，錯訛相對較少。而雙紅堂藏本鈔錄行距較密，前半尚工整，後半則略顯潦草。沈本所據底本似有蟲蝕，故間有空格，而此本則不脫，可以補足。沈本間有訛誤處，此本可作訂正；沈本間有語句顛倒或脫文，此本可補。故有其價值存焉。

此本鈔錄後，除鈔誤字直接改動外，也有許多地方有藏者據文意塗改、旁添字詞以補足文意者，而被塗改處沈本大多相同；旁添字沈本無，細審文意，原本或通，或係誤讀，故旁添字未必妥當。兩本丑角賓白語均用蘇白。

（九）清鈔本《蟠桃會》

此戲不知作者。一冊，書版高寬252×202公釐，葉心192×163公釐，十行二十字，有紅筆圈點。舞臺演出用本。凡二十三出（不作「齣」）。《重訂曲海總目》有著錄，列入「詞曲佳而姓名不可考」者；又《曲目表》、《今樂考證》等著錄，列入「國朝傳奇」和「本朝」內。

此戲出自明無名氏之《蟠桃記》。明胡文煥《群音類選》卷十二選錄有十二段，與雙紅堂藏本比較：

《群音類選》之《蟠桃記》	雙紅堂藏本《蟠桃會》
陳搏慶壽	二出慶春
王母玩桃	無
仙友談玄	無
洞賓問答	三出講法
點化珍奴	六出梯仙
道院閒談	無
表薦陳搏	相當於「七出徵聘」，文字全異
誕孫相慶	相當於「九出賀子」，文字全異
共友登途	無
瓊林賜宴	無
輸納買山	無
蟠桃慶會	無

十二段中，三段可見相同曲文；二段有相應情節；七段為雙紅堂藏清鈔本無。這說明萬曆間的《蟠桃記》，在明末清初經過很大的刪改。原劇以萬曆間一般傳奇的長度而論，當在四十出上下。清鈔本省作二十三出，刊落接近一半。

此戲另存懷甯曹氏舊藏本，現歸北京國家圖書館，二卷；又有清初四色抄本，浙江寧波天一閣，不分卷。此二本筆者未見。

(十) 清鈔本《倒銅旗》

此戲清焦循《曲考》著錄，未題撰人，列入「詞曲佳」之屬；《重訂曲海目》、《今樂考證》均從之。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十三列入清無名氏內，謂劇本已佚。

莊目之說不確。吳新雷主編《中國崑劇大辭典》有《倒銅旗》一目，謂「即明末李玉所作的《麒麟閣》，因原本長達六十一齣，頭緒繁多，崑班藝人便截取有關秦瓊拔倒銅旗一段情節，以《倒銅旗》的小本戲名演出。今存昇平署舊抄本，自〈拜旗〉、〈借兵〉、〈遣助〉、〈看報〉、〈倒旗〉、〈斬子〉至〈大考〉、〈賺關〉，相當於原《麒麟閣》第二本上卷一至十三齣。」³⁸按：吳氏之說甚是。《倒

38 吳新雷主編，《中國崑劇大辭典》，頁114。

銅旗》實為「小本戲」，長不過數齣，既有別於長篇的傳奇，又不同於摺子戲，也不能以雜劇視之。它是崑曲傳演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獨特的現象，值得重視。

崑腔小本戲《倒銅旗》，在清代頗受歡迎，傳演較廣，存本亦不乏。今知另存車王府藏清末鈔本《倒銅旗全串貫》，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亦藏多種晚清鈔本，據《俗文學叢刊》第六十五冊影印者，有綠綺山房《倒銅旗總本》、《倒銅旗崑劇》、百本張鈔本《倒銅旗》等。此外臺灣《國劇大成》亦收錄有《倒銅旗》一種。

而最早從李玉原作析出的《倒銅旗》傳本，當推雙紅堂文庫所藏之清鈔本。一冊，鈔錄時間不詳。版高寬201×125公釐，葉心180×100公釐。七行二十四字左右，無界，未標齣目，無分目序次，無句讀。書衣左上方寫有「倒銅旗」三字。

此本《倒銅旗》共三齣。其第一齣相當於《麒麟閣》的第四齣〈看報〉；第二齣相當於《麒麟閣》的第五齣〈倒旗〉、第六齣〈斬子〉；《倒銅旗》的第三齣相當於《麒麟閣》的第七齣〈俠救〉、第八齣〈郊壇〉。但曲詞與賓白上有所改動。

而車王府藏清鈔本、百本張鈔本等《倒銅旗》，則又從雙紅堂藏本《倒銅旗》中抽出〈倒旗〉一段，加以潤色完善而成。綠綺山房《倒銅旗》（《俗文學叢刊》469-507）、《倒銅旗崑劇》（《俗文學叢刊》509-533）、《國劇大成》之《倒銅旗》則更晚出。另有將《倒銅旗》之關口泗水關改為東嶺關，故名《東嶺關》。民國初黃月山復據崑腔改編為京劇《倒銅旗》；秦腔、豫劇亦有此劇目。故這一題材有近代戲曲舞臺上傳演甚廣。雙紅堂藏本作為傳演過程中重要的一環，自有其獨特的價值。

（十一）清鈔本《玉鴛鴦》

此戲為清周杲（果庵）作。清松茂堂鈔本，正文題《玉鴛鴦總講連台》，二冊，上下卷，凡四本三十二齣，書版高寬245×205公釐，葉心225×155公釐。半葉七行二十二字左右。

書衣左方題：「此肆本《玉鴛鴦》是《五彩輿》後本 / 准是嵩祝誠上包本戲 / 松茂堂。」

嵩祝誠，即嵩祝成班，係清同治三年（1864）由太監寶成等所組織的崑班。松茂堂為司坊之堂名。可知此為清末鈔本，原為梨園世家之遺物。

此戲另存舊鈔本，北京圖書館藏，《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據以影印，未題撰人，凡三卷三十二齣。與影印本相較，雙紅堂本多第一齣〈拱星〉，演西池王母奉玉帝旨意，遣弄玉與蕭史下凡應劫，一降生揚州謝瑩璧家，一降生蘇州文守仁家，後日仍為夫婦。送其下凡時，有許飛瓊與董仙女送弄玉而蕭史與之相戲，王母發覺，一併下凡，一托生徐階為女，一托生東方義為女，後日共嫁蕭史下凡之謝生。此種結構，似是晚明及清初俗套。

影印本最後一齣〈謔鬧〉與〈月圓〉合為一齣，缺半頁，未完。與雙紅堂本比較，少〈證圓〉一齣。〈證圓〉與〈拱星〉相應，構成大團圓結局。

兩本齣目有較大出入，但多為齣目不同而內容相同，或合二齣為一齣。序次亦間有不同。如三集本〈避倭〉（雙紅堂本作〈訛認〉）、〈劫賄〉、〈假信〉（即雙紅堂本〈驚信〉）、〈誤劫〉。雙紅堂本之順序作〈驚信〉、〈劫賄〉、〈誤劫〉。但比較之下，雙紅堂本顯然更為完整。

（十二）清鈔本《瓊林宴》

此係崑弋腔演出用本，二本二十四齣（目錄作「齣」，正文作「出」），二冊裝。書版高寬225×133公釐，葉心185×95公釐。半葉五行二十字左右，朱墨圈點，無界。

此戲另有車王府藏清鈔本《瓊林宴全串貫》、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藏嘉慶二十四年鈔本等。雙紅堂藏本與車王府曲本《瓊林宴全串貫》一致，當出自同一系統；而他本則間有差異。據《古本戲曲劇目提要》所作劇情概要，結尾處作「因西宮娘娘保奏，登雲被貶為庶民」，雙紅堂本、《曲海總目提要》均作鋤死葛登雲；而葛登雲妻女放走玉貞事，《古本戲曲劇目提要》與《曲海總目提要》等同作後門縱之而去，雙紅堂本則作贈舊衣一件、白銀五兩。故此本為瞭解《瓊林宴》之傳演、變遷，提供了一個新的版本。

（十三）稿本《桃園記》

此為清末精鈔本，一冊，毛裝。除長澤之藏書印外，無其他印章。版高寬

245×135公釐，葉心200×113公釐。曲文半葉四行，行二十至二十一字，附工尺；白文半葉八行。此本抄錄後偶有貼改，工尺間有濃墨點改。書衣題「仙境情緣」，當爲此劇別名。正文首頁題「艸堂居士訂譜 雲槎外史填詞」。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十二「雲槎外史」名下著錄，謂作者姓名、字號、里居皆未詳，「此戲未見著錄。《三國志》戲曲中首有《桃園記》，係明初戲文。不知此記所敘同否。佚。」³⁹

按：雲槎外史爲清代著名詞人顧春之號。顧春（1799-1877），字梅仙，號太清，自署西林春或太清春，號雲槎外史。擅詩詞，兼工繪事，尤以詞稱，與納蘭性德齊名。著有詩集《天游閣集》、詞集《東海漁歌》，又作有小說《紅樓夢影》二十四回。筆者另訪得河南省圖書館藏署雲槎外史之《梅花引》戲曲一種，可知顧春還是一位重要戲曲作家。

顧春本姓西林，滿洲鑲藍旗人。祖父鄂昌，官至甘肅巡撫，乾隆間因受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文字獄牽連而被賜自盡，從此家道中落。道光四年（1824），太清年二十六，冒榮王府二等護衛顧文星之女呈報宗人府，成爲貝勒奕繪之側室福晉。奕繪《浣溪沙·題天游閣三首》第二首：「此日天游閣裏人，當年嘗遍苦酸辛。定交猶記甲申春。曠劫因緣成眷屬，半生詞賦損精神。相看俱是夢裏身。」（《南谷樵唱》卷一）「曠劫因緣」，已經透露出當年他們的結合曾遭受的磨難。太清《定風波·惡夢》詞也敘及她早年的坎坷生活：「事事思量竟有因，半生嘗苦酸辛。」

顧太清之《金縷曲·題〈桃園記傳奇〉》云：

細譜《桃園記》。灑桃花、斑斑點點，染成紅淚。欲借東風吹不去，難寄相思兩字。遍十二、欄幹空倚。冰雪肌膚人如畫，繞情絲蹙眉春山翠。仙家事，也如此。凌風待月因誰起？總無非、心心相感，情情不已。南海觀音慈悲甚，泛出慈航一葦。渡仙女、仙郎雙美。記取盟言桃花下，問三生石上誰安置？得意處，莫沈醉。

此詞見於太清詞集《東海漁歌》卷四，⁴⁰作於道光十九年（1839）。集中前詠殘荷，緊接此詞爲《茶瓶兒·病中謝友人贈茶》，後題中秋，則詞當作於夏秋

39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頁1482。

40 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260。

之際，《桃園記》傳奇或成於春夏之際，時丈夫奕繪去世適一載，顯為懷念伉儷之情而作。劇中綠萼華，即太清自寓；白鶴童子，則寓太素。綠萼華與白鶴童子相戀遭譴，因觀音大士普渡慈航，終得投胎於世族名門，成就良緣，實寓太清與奕繪結合過程中的磨難曲折之情。

庚子（1900）國變，太清之子孫未能謹守其書，書多散佚。《東海漁歌》殘本，時人得之冷攤。足本稿本《天游閣集》，為內藤湖南所得。《桃園記》當即同一原因而散出。⁴¹

筆者因《桃園記》而訪得《梅花引》，因此二劇而考知太清嫁奕繪前嘗有婚史，以此之故，雖與奕繪相慕相戀，而一度遭王府拒絕，遷延四年，至道光四年（1824）二十六歲時，才獲同意。又因此而探顧太清與龔自珍交往之事，蓋嘉慶二十五年（1820）初，太清與奕繪情事初遭挫折時，定庵適在北京，道光二年壬午（1822）前，在太清寡處而嫁給奕繪一度無望之時，兩人有機會相識。故定庵之壬午前所編、所撰之《無著詞》、《小游仙詞》十五首中，有部分篇什可能是寫給顧太清的，並可與《己亥雜詩》第二〇九首「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相印證。後人傳聞之定庵與嫁入貝勒府後之太清始有「曖昧之情」，亦當是因此而附會。此事容有另文述之。要之，因雙紅堂所藏之《桃園記》，上述諸事乃得略窺一隙也。

此外，文庫所藏傳奇，尚有明末凌氏朱墨套印本《繡襦記》，明末刊吳炳《西園記》，清末陳湘記鈔本《精忠譜（五人義）》（清李玉撰）、康熙刊周稚廉的《雙忠廟傳奇》，康熙刊洪昇《長生殿》，清道光九年（1829）芸香閣刊仲振奎《紅樓夢傳奇》，民國初裕興齋鈔本《天香慶節傳奇》二卷十六齣，等等，也值得一提。

但今歸入《雙紅堂文庫分類目錄》「傳奇」類中，亦存有分類不當之處。如《獅吼記》僅四齣，為民國石印本，係崑曲散齣。《思凡》，嘉慶二十二年忠志堂郝氏鈔本一冊，實僅為一折子。《雙玉鐲》，實為一組角本折子戲之合綴，今藏者作獨立傳奇著錄，郭英德氏《明清傳奇綜錄》頁一一八八據以移錄，以為有此名之傳奇，遂致誤上加誤。

41 參見拙文〈顧太清的戲曲創作與早年經歷〉，《文學遺產》，2006年第6期，頁88-95。

下篇、雙紅堂文庫所藏花、雅戲曲與俗曲曲本

《雙紅堂文庫分類目錄》，於雜劇、傳奇而外，設崑曲、高腔、亂彈、二黃、梆子及地方戲、總集，均屬清代花部、雅部之曲本。這批曲本數量甚鉅，以內鈔府本、車王府舊藏曲本和百本張鈔本，最引人注目；為數不少的藝人、戲班及戲曲愛好者的鈔本，亦足珍貴。

(一) 內府鈔本

雙紅堂文庫藏內府鈔本戲曲中，有「崑曲」與「皮黃」、「亂彈」、「梆子」等，超過一百種。

出於內廷所編戲本者，有《慶賞中秋唐明皇遊月宮崑燈戲總本》（共六場），《鼎峙春秋》（第九本下存六齣，第十本上存三齣），《闡道除邪（混元盒）》（存第二冊，即頭本第五至八齣）。其中《鼎峙春秋》有大量改筆，可據以瞭解內廷演出中改戲之情況。

清內府鈔本崑曲類曲本中，有附工尺譜五種五冊：

《喜朝五位、歲發四時曲譜》，四行附工尺十八字左右，紅筆圈點，205×133公釐，葉心170×90公釐。此為昇平署月令承應戲。本冊所收二種，係元旦承應戲。另見《昇平署月令承應戲》排印本收錄。

《訪普曲譜》，四行附工尺二十字左右，紅筆圈點，書版201×132公釐，葉心175×92公釐。

《相調》（書衣題簽已失），四行附工尺十八字，書版232×152公釐，葉心165×100公釐。此折出自《孽海記》。

《虞廷集福》（白狼角本，第七至九齣），五行十八字左右，書版243×147公釐，葉心200×105公釐。

《慶祝長生（萬壽長生）》，「洪崖先生」角本，八齣（第一、六齣無），六行十七字左右附工尺，書版250×145公釐，葉心210×105公釐。書衣及第八齣題「萬壽長生」，第一、六齣無生角戲，故付闕如。

又有《內鈔崑曲總本》十二種，十二冊，書版272×195公釐或262×191公釐，葉心165×105公釐不等。半葉四行或五行曲文，附工尺，行十二字左右。

第一至第十冊：

《壽祝萬年總本》（清內廷承應戲）；《南浦總本》（《琵琶記》）；《水簾洞總書》；《遊園驚夢總本》（《牡丹亭》）；《琴挑總本》（《玉簪記》）；《偷詩總本》（《玉簪記》）；《陽關折柳總本》（《紫釵記》）；《奏朝草詔總本》（《千忠祿》）；《雄黃陣總本》（據《雷峰塔》中〈求草〉、〈救仙〉改寫。封面有記「改妥寫得二本」，內附有草書改稿一頁）；《藏舟總本》（出《漁家樂》，半葉四行十八字左右，曲文附工尺。與上條為同一種，而較上條各本為寬）

第十一、十二冊：

《戰洛陽總書》（敘隋唐之際王世充與李世民交戰於洛陽事。京劇有同題材同名劇碼）；《祥芝迎壽四齣總本》（清宮承應大戲。238×141公釐。四行曲文附工尺十八字左右）

按：內府鈔本的特點是版式天頭地角甚是寬大，書衣多是加糊一張黃裱紙，左上貼一寸寬之紅紙作書箋，題以戲名。正文鈔錄工整，行距較寬，有朱筆句讀。而普通藝人鈔本、文士鈔本則多呈窄長，字細而密，字跡潦草。

雙紅堂文庫中，尚有二割標作亂彈或皮黃的內府鈔本。

一是《亂彈劇本》三十三種，半葉五行或六行，行二十二字左右，共三十四冊。版高寬270×180公釐，葉心215×104公釐。具體名目如下：

《三教寺頭本》（附頁抄《獻長安萬修》角本）

《五臺山會兄》（冊末空白頁另筆附抄《連環記》一段）

《文昭關》

《回朝》

《打龍袍》

《四傑村》

《定軍山總本》

《東昌府》（書衣記：「此本後有法場」；中夾寸長紙簽：「從此往下接寫」；末夾紙簽：「末場由四紅文堂、四大鎧、四劊子手起。施公上念。狂徒色膽包天，朝廷法律嚴。念完接黃天霸等上。」）

《花田錯總本》（四本，二冊）

《青峰寨總本》（書衣題：「五月廿六日照此本分全角齊了。」「改妥。寫得

一本。又寫得二本齊了。」按：原鈔本似出坊間，多別字，訛字，故有墨筆訂正二十餘字)

《查關總本》

《洪羊洞總本》

《虹霓關總本》(書衣題：「改妥。寫得二本。」有大量改筆，涉及情節、文字的不同處理。如戲中稱「賤人」等處，均予刪改。如「看賤人」改作「看他」之類。從中可見內廷改戲的準則與思路)

《捉放總本》(書衣有三題識：「對過，不必改了」；「寫得一本」；「又寫齊一本」)

《破洪州總本》

《胭脂虎總本》

《淮安府》

《連升三級總本》(書衣有紅筆題識：「分寫一小生一丑」。又於紅筆上書墨筆：「分總本」)

《登臺笑客》

《陽平關總本》(書衣有二不同筆跡的墨書題識：「黃忠改了；曹操改了。」「五月初四日照此本分角。」內對曹操、黃忠二人之唱白有較多刪改，改者書法嫻熟)

《黃金台》

《惡虎村總本》(書衣無紅箋，左上書「惡虎村總本」，右下書「遲煥卿」，出同一人之手)

《群英會總本》

《摔琴總本》

《碰碑總本》(此本作半葉八行，行二十四字)

《翠屏山總本》

《趙家樓》

《鎮檀州總本》

《闖山總本》

《鐵弓緣總本》

《繡老媽總本》(書衣紙捻上有紅筆題識：「宣統十年二月廿三。」內文多用

紅色墨水的鋼筆標識科介。蓋溥儀遜位後，猶在故宮內唱演，此即其本。而內府鈔本的概念，當下迄1924年溥儀搬離故宮之時。）

《美人圖總本》

《松雪緣》第四本（第二十五至三十二齣：〈托夢〉、〈遣將〉、〈求救〉、〈釋罪〉、〈春榜〉、〈認母〉、〈團圓〉、〈封贈〉）

二是《皮黃曲本》四十八種，四十八冊，版高寬260×170公釐，葉心177×115公釐。半葉五行二十字左右，紅筆圈點。細目如下：

一捧雪	五雷陣	天水關	文昭關	打金枝	打嚴嵩
取帥印	夜戰	定軍山	法門寺	空城計	金鎖陣
南天門走雪	查關	洪羊洞	紅鸞禧	〔彩樓配〕	望兒樓
御果園	探窯	清官冊	渭水河	黃鶴樓	落園
穆柯寨	戰北原	戰成都	戰蒲關	寶蓮燈	十字坡
下河東	千秋嶺	加官進爵	玉門關	玉玲瓏	甘露寺
米注山	陰果報	取金陵	刺字	探五陽	擋諒
董家山	滾釘板	鳳鳴關	盤河戰	藥茶計	〔佚名〕

此四十八種筆者往日未及細讀，而近期東文研正在裝修，其藏書不可得見，故僅列其目。

雙紅堂文庫還藏有內府鈔本《梆子戲本》六種，六冊。重裝本，已失原有書衣。高寬260×170公釐，葉心180×115公釐。半葉六行十七至二十字不等。名目如下：

三上橋 孔明弔孝 教子 斬子（題下原註「梆子腔」） 頭進宮 鋤包河

以上每種獨立一冊。第一、二、五種有紅筆圈點。當是因第四種有「梆子腔」註，故將此數種均歸作「梆子戲本」。

清代宮廷演劇甚盛。其所用之本，今通稱為內府鈔本。內廷設班演劇之事，康熙朝已成規模。至乾隆而至大盛，所置內府戲班，有南府及景山二處，人數或多至一千四百餘人。迄道光七年（1827）置昇平署，遣散民籍學生，內廷演劇人數銳減，南府與景山之舊有演劇人員及演劇所用之物，均歸昇平署管轄。乾隆以前，內廷演劇多自編自演，故有宮廷大戲與節令之戲傳世。所演亦以雅部崑弋腔

爲主。咸豐之後，亂彈盛行，漸入於內廷。至光緒朝，西太后尤喜觀劇，且精通戲劇，能指導改戲。又屢命藝人入宮演出，時人稱之爲「內廷供奉」。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宮廷而外，各王府亦盛演劇。故晚清戲曲之興盛，宮廷及王府之喜好，是一重要因素。如今猶可見蒙古親王車登巴咱爾王府舊藏戲曲，數量達數千種。而宮內所藏，更多至萬冊。這些內鈔曲本，在1924年溥儀出宮前後，紛紛散出。朱希祖即在1924年從書肆覓得昇平署檔案數百件，因朱氏1931年方撰文披露，故不爲人知。至1928年前後，松筠閣等舊書鋪猶採得大批內府鈔本出售，後大都散入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以及長澤規矩也、傅惜華等私人手中。今知內廷舊藏曲本，除北京故宮之外，北京圖書館（原朱希祖之舊藏）、臺灣中央研究院（1928-1929由劉復主持購得），均有收藏。而齊如山、長澤規矩也、傅惜華等人之收藏，也爲數不少，今亦歸於公立圖書館。筆者有意爲之編製一個總目，擬細列收藏之處，詳考昔日之記載，比較傳本之異同，唯尙需假以時日。

但細觀所謂內府鈔本，其實大多是從民間採集而來。爲百本張等書坊所鈔。道咸之際，王府與內廷購置曲本，對用紙、開本及字跡，均有專門要求，不得在曲本中出現書坊印記。故偶可見車王府舊藏曲底頁原有印章，必用水洗擦之，而痕跡猶在。至光緒朝後期，此例稍鬆。如今觀故宮所藏曲本之影印本，書衣上不乏「百本張」等書坊的醒目印記。

不過，曲本雖然來自民間，如果要在宮內演出，仍需經專人審讀刪改，然後重新抄正，方能演出。故一劇而同時有總本、全串貫，有角本。並有精鈔者如「安殿本」等，供皇帝、太后觀劇時所閱。

雙紅堂文庫所藏內府本，有許多爲初次從民間採擇之本，故屢見刪訂、核對、付抄之識語。這些施以改筆的本子，對於瞭解宮廷如何改戲，如何處置違礙，其趣味如何，等等，均具價值。如前引「改妥」之本，於罵女性爲「賤人」等詞，均予刪正，當是因懼西太后之不快而改。且通常宮中改過之本，會成爲此後戲院演出的定本，從中又可見內廷改劇對晚清戲曲之影響。

（二）百本張鈔本與以鈔書為業的書坊鈔本

長澤規矩也自謂從1927年認識馬廉以後，方知世間有百本張鈔本，遂傾力收購，所得亦豐。不僅有戲曲，而且有子弟書、鼓詞等俗曲鈔本，數量最多，且多別具價值。

百本張是北京以鈔書售俗曲爲業的最爲著名的書坊。始於乾隆年間，至光緒前期達到鼎盛。庚子國變後漸趨衰歇。其所售書，書衣有墨色戳記。初僅「百本張」或「百本張／別還價」雙行，約一寸高，半寸寬，四周雙邊。稍後增大爲兩寸高，一寸寬，中間仍爲「百本張／別還價」兩行，四周有5公釐寬的花欄，左右鐫「童叟無欺、言無二價」；或中爲：「百本張」字，左右爲「童叟無欺／言無二價」，而上下有「世／傳」二字。戳記旁間有兩行紅字或墨記，「住西直門大街高／井胡同張姓行二」。後期則更爲繁複，如作「本堂書戲岔曲當日挑看明白言明隔期兩不退換／諸公君子莫怪由乾隆年起至今少錢不賣住西直／門內高井胡同中間東小胡同東頭路北張姓行二」。

百本張所鈔書有戲曲、鼓書、子弟書、岔曲等，均有自編書目，目下標有鈔書之價格。顧客可以按目索要。其底本來源較古，多爲當時流行之曲，數量達數千種。在北京隆福寺、護國寺等廟會上設攤售賣。長澤規矩也曾得《百本張大鼓書目》等二種，不過沒有隨曲本一起售給東京大學，而是保留在自己書齋中。

雙紅堂文庫藏有百本張鈔本皮黃十二種，大鼓書七十一種，子弟書二十五種，快書九種，蓮花落二十六種，岔曲五十六種，石派書七種，可謂蔚爲大觀。爲研究清代百本張鈔本的情況，提供了很好的樣本。

大鼓書中，有十三種爲《百本張大鼓書目》所未錄者：《百花名逛花園》、《州西坡》、《十三月古人名》（舊目漏列）、《丁香割肉》、《邪口語竊打朝四本》、《爭燈》、《三度林英》、《藍橋會》、《洪武放羊》、《密建游宮》、《雙鎖山》、《無義之徒》、《箭攢羅成》。

雙紅堂所藏子弟書二十九種，有二十六種爲百本張鈔本（其中《蝴蝶夢子弟書》四回因爲上有典型的百本張印記，長澤沒有售給東大，而是留在案頭。故東大實藏二十八種）。波多野太郎氏編《子弟書集》，取日本公私所藏，凡五十餘種，出於雙紅堂者過其半數。⁴²於此亦可見雙紅堂文庫藏品之豐富。

另外，雙紅堂文庫有車王府舊藏曲本三十餘種，含二黃全貫串本二十二種。《宮門掛帶》、《卜卦吃子》、《雙官誥》、《夢兒樓》四種，封底有印章漬痕；其中《雙官誥》有二印，一印可辨別爲「百本張」三字。也就是說，這一批車王府舊藏的曲本，相當一部分自出百本張鈔本。照此推斷，今日所存之車王府

42 參見波多野太郎編，《子弟書集》。

舊藏鈔本曲本，並非王府自錄，而是從坊間購入的。這是筆者五年前校讀雙紅堂文庫藏本後的一個假設。而據雷夢水等人的觀點，車王府曲本中有「稿本」。且「車王府曲本」的稱呼，很容易讓人有車王府之人所寫，或車王府所鈔的感覺。因此這些藏本的來源必須加以探討。後來我在考察北京大學、首都圖書館藏車王府舊藏近三百種子弟書時，發現其中近十種鈐有「百本剛」印記，有幾種有「百本張」印記。從而證實車王府舊藏曲本來自坊間，既不是稿本，也不是由車王府自己鈔錄的，而是從專門鈔書的書坊買入的。只是車王府對這些鈔錄的曲本要求很嚴。其體式是按內府鈔本的要求，書衣有紅籤，而且不得出現書坊的印章。凡已鈐印章者，都必須去掉。所以子弟書藏本中，多有封底原有印章，然後洗去之，隱約可見其痕跡；或者是長篇子弟書，因為冊數較多，其中間數冊偶有印章，藏於其間，不易發現，售者心存僥倖，未加掩飾，才給我們考察其來源提供了方便。從我對子弟書版本的比較研究看，車王府藏曲本的收藏時間相對較早，主要為道光間所藏，而且收藏的時間相對集中。因而對於研究皮黃初起時的北京劇壇與曲藝界，具有重要意義。故準確稱呼，應是「車王府藏曲本」。

雙紅堂所藏百本張鈔本中，還有一種百本張鈔本高腔《拷童》，書衣有墨印：「百本張別還價」及墨書一行：「不對換錢十倍」。篇末附有一刻印的紙頁，詳細說明高腔曲本鈔錄時所附書的標記的意思。全文如下：

唱句點是連着唱的。○此一道帶圈者是打斷的，落句幫去一字。○竟圈此圈者也是打斷的，落句滿唱出來的不幫。———攔此道者是幫的腔。———攔此散道者是有幫的，有唱，有幫了又唱的。———○攔此散道帶圈者，也是有幫的，有唱的，有連幫帶唱的，算幫一字。———○此散道下單一圈者，也是有幫的有唱的，有連幫帶唱的，算滿唱出來的。———○此散道帶長道一圈者，全前一樣，長整道攔在那裏，那裏幫去。———此散道帶長道勾者，同前散道帶圈一樣。———○此一點又一圈一道者，是有連着唱的，有打斷了的點挨句連唱唱的，多圈，挨句打斷了的多。○此一圈一點也是一樣。七七，此雙拐是重一句。七七七七，此四拐是重兩句。有跨小字批者，那字應唱，那了哪字應說，那裏跨也可者，是有那們著的，有這們著的，按大字的少，按小字的少。句中有小見者是虛尖字。再有不明之處，記來問。

雙紅堂文庫於「高腔」列有八種曲本，多係道光、咸豐間鈔本。如道光二

年（1822）鈔本《進寶慶壽》（書衣題：八國進寶）；清咸豐四年（1854）鈔本《救主》全串貫（出《金丸記》傳奇）；咸豐九年（1859）鈔本《教子》（出《商輅三元記》）；咸豐十年（1860）鈔本《訴夢·打圍》（書衣題：女中傑，咸豐十年八月十六日抄。故此冊當題作《女中傑》，原從李玉《昊天塔》第十八和二十三回派生出來）。咸豐十一年（1861）鈔本《爭功·請罪》（書衣題：廉藺爭功，咸豐十一年七月九日抄）。又有「養和堂鄭記鈔本高腔劇本」十種及「高腔曲本三種」（含二十餘齣高腔之角本）。這些高腔曲本，大多有紅筆或黑筆對其唱法作詳細的標識。故前列百本張鈔本所附說明，對於研究高腔唱本所標識的唱法，別具價值。

除百本張鈔本之外，雙紅堂文庫還藏有老聚卷堂、別楚堂、匯劇堂、文藝齋鈔本等書坊的鈔本。

所藏老聚卷堂鈔本皮黃曲本有《五雷陣》、《文昭關》等九種，子弟書鈔本有《雀橋密誓》二回、《藏舟》五回、《春香鬧學》三回。這些曲本書衣中間都有「老聚卷堂／起首第一」墨色印戳；右方裝訂線中間有「言無二價」墨記。從聚卷堂而已經成爲老字號，表明這是清末的鈔本。

別楚堂鈔本有皮黃《教子》，梆子腔（秦腔）《抱盒子》、《渭水河全串貫》，別楚堂鈔本書衣有「別楚堂記／與衆不同」或「別楚堂寶／與衆不同」的印記。

所藏百本堂陳記所鈔本曲本一種：梆子腔曲本《破紅州》。百本堂的印記最爲繁複。上層二行橫書爲「京都／正陽門外」，下半主體中間豎書爲「百本堂陳記」大字，左右刻有詳細路名門牌，並謂出售有抄本戲本西皮二黃梆子時曲大鼓書等。

所藏敦厚堂曲本一種：梆子腔曲本《打金枝》，書衣有「敦厚／堂志」木記。

清匯劇堂鈔本有梆子曲本《謀館全串貫》二本，《賭錢怕老婆全串貫》，《蘆花記 全串貫》，書衣爲「匯劇堂」三字木記。

所獲清末文藝齋鈔本長篇鼓詞四種：光緒二十九年（1849）鈔本《回龍傳》十六冊、《銀盒走國》二十四冊、《桃花記》十二冊、《大明萬隆》十冊。書版高寬262×125公釐，葉心210×90公釐，爲窄長本，書衣右上爲「一天一換」木記；右下爲「文藝齋」的大方印。這是清代賣饅頭的蒸鍋鋪出租使用的本子。其中《大明萬隆》沒有售給東大，當是留在了長澤的案頭。

百本堂以下各家書坊的鈔本傳世甚少，時至今日，這些書坊的鈔書及相關的活動情況，已經難以明瞭。雙紅堂文庫所藏，為研究晚清各鈔書為業的書坊的情況，提供了很好的標本。

（三）戲班鈔本及戲曲愛好者鈔本

長澤規矩也於所見戲曲本子，似不論品相，來者不拒。亦因細大不捐，所得乃多。

如《討釵》一種，係道光九年（1829）梅卿鈔本，一冊，八行二十六字左右，書版260×121公釐，葉心258×95公釐。書衣題「曲本」，署「道光九年三月初八日寫 丁春喜大」。顯為藝人寫本，字體拙劣。末頁有「梅卿寫」三字。按：丁春喜，《金台殘淚記》有記載，為道光間四喜班崑腔旦角演員，字梅卿，揚州人，喜崑腔而不願改學亂彈，為當時少數堅守崑劇的名伶。此本《討釵》出明月榭主人《釵釧記》第十三齣〈相罵〉，崑曲折子亦名「相罵」。梅卿鈔錄此本時年方二十一歲。

「崑曲」曲本中，清嘉慶二十年（1815）郝氏忠志堂鈔本《思凡》，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維楊三槐堂鈔本《瑤台附女彈詞》，清徐乃昌手書《潑水》等，亦可寶貴。

所得養和堂曲本，有《養和堂鄭記鈔本高腔劇本》十種，清鈔本，十三冊。版高寬217×124公釐，葉心185×100公釐。所錄有《訪友》（《同窗記》）、《判斷》（未詳出處。敘圖大漢，大花子拐小孩事）、《罷職》（未詳出處，敘包公斷趙大夫妻謀殺劉士昌主僕一案被罷職）、《雙釘記》（如題，為京劇同名劇之祖本）、《甯武關》（如題，錄有：〈對刀步戰〉、〈求子〉、〈別母〉、〈亂箭〉、〈夜奔〉（水滸記）、〈歸妹〉（與崑腔折子戲〈嫁妹〉不同））、《和合降祥》（未詳出處）、《問安》、《說降》（《古城記》）、《遊春》（《蝴蝶夢》）。高腔曲本傳世甚少。此集彌足珍貴。此外，又有《養和堂曲譜》一冊，含《北餞》、《旅夢》二種，係崑曲曲本，內有題「道光拾二年桂月重錄」。可知這些養和堂曲本均為道光間鈔本。

文庫另有《明煥記曲譜》、《鑫記鈔本曲譜》、《且問予屋曲譜》、《琴演工尺雜錄》、《百壽堂松記曲譜》、《求真我齋曲譜》等，均為崑曲折子，附有工尺。

而最突出的是幾種出自崑曲愛好者之手的鈔本。

一是陳湘記鈔本。這是長澤規矩也在昭和五年（1930）在蘇州得到的曲本。共有十八冊。其中有整本戲者，如《精忠記》（實即《五人義》）、《荊釵記》等，而更多的是帶有工尺的折子戲。鈔錄時間在宣統前後。如《霓裳雅奏》（雙紅堂·戲曲·154），書衣題「宣統二年庚戌荷月錄 湘七十歲鈔」；《霓裳雅奏》（雙紅堂·戲曲·153），書衣題「湘七十二錄」。可知這些都是陳氏晚年鈔錄以自娛的曲本。今文庫編目中，雙紅堂·戲曲·153-162，標《張氏曲譜》共十五冊，其實均是陳湘記所鈔曲本。唯因第152種，係咸豐間藝人鈔本，書衣有「張□記」，故長澤規矩也用作書名，稱《張氏鈔曲譜》，而將此下十餘種陳氏鈔本，均以「又」字貫之。見其《家藏舊鈔曲本目錄》。而東洋文化研究所入藏及編目均仍之。其實這些曲本與「張氏」全無關係。

但從陳湘記所鈔曲本，可以窺知當時蘇州之崑曲愛好者所喜愛的劇碼。

二為李懷邦所鈔曲本，為雙紅堂·戲曲·141，精鈔本。凡五冊，所錄崑曲單折近九十出，均附工尺。長澤規矩也以其卷首有「從吾所好」閒章，而用作此集之名。按：此書各冊扉頁均題「蓋臣氏雅集」，似以之作此輯之名，更為恰當。扉頁背面又書「蓋臣李懷邦集注」。並有「蓋臣」、「從吾所好」等印章，故知李氏名懷邦，字蓋臣。此為其李氏手錄清稿本。四行附工尺約十六字無白文及科介。第五冊為曲譜專用紅格稿紙抄錄，三行十五字。高寬241×128公釐，葉心225×105公釐。有紅筆圈點。

三為清魏闢泉編《崑曲三十五種》，係雙紅堂·戲曲·142。凡十六冊。每冊含數種。原無題名，首冊有目錄，題「崑曲三十五種目錄」，故擬此名。均附工尺譜，第十六冊書衣題「乙卯菊月錄，魏記」，知為1915年前之後鈔本。各冊書衣均題有「魏闢泉」或「闢泉」。四行十二字左右附工尺。重裝本230×150公釐，原高230×149公釐，葉心約210×120公釐。然函封題作「照鏡曲譜」，則不知何據。

四是澹然所編崑弋曲集付印用的底稿二種。

其一是《崑弋顧曲考初集》（內題「崑弋曲譜」），為雙紅堂·戲曲·131。係1918年9月鈔本，八行十七至二十三字不等。一冊。238×131公釐，葉心195×103公釐。首有〈序〉，云：「蓋人生世上，言發乎情，行止乎禮，此天下之常

經，萬古不易者也。然而有時或因喜而狂歌，因怒而激烈，因憂而悲傷，因思而愁歎，此又性情中之迭。更有不可遏者。事考之虞書堯典，群臣喜作賡歌；禹征有苗，興感起舞，是歌舞之一道，自古有之。以後周召興詩，敦風作俗；列國吟詠，寄寓褒貶。又歌舞之繼續，卒未大興於世者，固有年。至於楚思令尹，優孟衣冠，仍其次者也。後至於唐玄宗，幸蜀歸馬，南內無聊，頓憶舊事，因召張徽奏曲，復招集梨園子弟，撥弦弄竹，雅奏清歌，此則劇界之鼻祖，俳優之模範云云。奉行此道者，雖不乏人，然奏崑歌弋者，則以淡淡無多矣。適近年崑弋盛行，惟乏依從，實聆者之一大憾也。余友澹然君，素嗜崑弋，善本尤多，雖不足五車，亦有數千種，原（願）付諸石，以公同好。倘遇顧曲大家，則幸甚矣。戊午九月上澣蚩蚩子序。」

後附：「預見告三集目：全本黑驢告狀；

預告四集目：全本神威箭〔即射張獻忠〕；

〔本集〕戲目：點魁、倒銅旗、走邊、報信、祭風、激秀、定計、探莊、報路、射燈、請猴、醉詔、功勳會。

預告二集目：撞幽州、桃花山、禦果園、西川圖、雙合印、連城壁、百花亭、北平府。」

又「《小引》：夫戲劇者，即古之所謂俳優也。原夏桀既棄君綱，求俳優以爲奇樂，繼而楚有優孟衣冠，以回人意。至崑曲，則始于唐代明皇；弋調，則出於宋時南渡。其腔節之清聽，字句之真切，較之秦徽二腔，大有超越。近數年來，研求無人，幾有失傳之意。殆目今崑弋之風，流傳甚廣，頗稱一時之盛。以致聆者日多，皆所欣悅。其所憾者，惟無籍適考耳。余故有家藏崑弋甚多，與坊間售者迥異，屢有友人敦迫至再，不得已遂檢搜最合時宜者，當陸續付印，以爲知音共相賞也。戊午九月，澹然自識。」

末有版權頁記載，此爲排印所用的底本。自畫版權頁，時爲「中華民國七年」；「版權所有」框內，鉛筆寫「澹然」二字。下方：「編輯人 澹然／校閱人 劇隱／發行人 □□□□／印刷所 □□□□／發行所 □□□□。」均出澹然手筆。故知此爲編者擬定付印之初集底本，唯今未見印本，疑未曾付印。據此集所選，與下條相較，此集係編者據下條所集舊鈔本重新撮抄而成。

其二是《新編崑弋劇考、盛明餘韻初集》（原二冊，存上冊）。澹然編。1918年序鈔。正文係彙集清百本張鈔本等而成。五行二十字左右，一冊。版高寬200×

116公釐，葉心約185×88公釐。是為雙紅堂·戲曲·132。

卷首〈小引〉：「余素嗜崑弋，幾于成癖。家存傳奇雜劇，可數千集，半皆《綴白裘》、《納書楹》、《過雲閣》等書所無之種。近因崑弋盛行，為各界人士皆所欣悅。惟苦無籍適考。余因表諸同志，特搜集崑劇弋譜，當陸續付諸石印，以為知音共賞也。戊午歲榴月書於綠漪山房南窗下。澹然謹識。」

目錄：點魁、六殿、七盤山、東遊、倒銅旗、打父、扣當、請猴、醉話、功勳會、走邊、報信、祭風、激秀、定計、報路、射燈

按：〈請猴〉以下為下冊，今佚。據澹然所言，1918年前後，「崑弋盛行，為各界人士皆所欣悅」，故編此以供知音共賞。對於瞭解民國初年崑弋腔之演出情況，有其價值存焉。

澹然，當即陳澹然（1860-1930），安徽桐城人。字劍潭，一字劍人，號晦堂、淮南漁隱等。光緒十九年（1893）舉人。官候補道尹。民國初為袁世凱總統府顧問，然嚴拒入「籌安會」。雖出生桐城而不喜桐城之文，譏其為「寡婦之文」，時人目為「狂生」。1926年成立安徽大學時，受聘為教授，授中國通史。民國初嘗應江蘇省省長公署顧問、江蘇省通志局提調等銜，並任安徽省通志館館長職。所著有《晦堂文鑰》、《江表忠略》等。澹然精於戲劇掌故，撰有《異伶傳》，敘程長庚、譚鑫培、汪桂芬諸人，張次溪《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亦收錄。今人僅知其精於京劇，於此外之戲劇活動幾無所知。雙紅堂·戲曲·133並有市隱編集之《昆弋曲譜第二集》，1918年11月排印本，發行人文實權，北京永興寺廟內發行，錄有昆弋曲折子二十五齣。當亦出澹然之手。蓋劇隱、市隱、淮南漁隱，疑即同一人也。

雙紅堂文庫所藏曲本之豐富，其價值之重要，遠非一文所能涵括。且此文亦已過長，故暫且就此打住。

引用書目

- 大倉文化財團編，《大倉文化財團漢籍善本目錄》，東京：大倉文化財團，1964。
- 大庭脩編，《宮內廳書陵部藏 舶載書目 附解題》，京都：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72。
-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 王漢民、周曉蘭，《孟稱舜戲曲集》，成都：巴蜀書社，2006。
- 江上波夫主編，《東洋學の系譜》第2輯，東京：大修館書店，1994。
- 吳新雷主編，《中國崑劇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 波多野太郎編，《子弟書集》，《橫濱市立大學紀要》人文科學第6篇，中國文學第6號，1975。
- 長澤規矩也編，《雙紅堂文庫分類目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61。
- 長澤規矩也編，《明清間繪入本圖錄》，東京，汲古書院，1980。
- 長澤規矩也著，《長澤規矩也著作集》（11卷），東京：汲古書院，1982-1986。
- 胡適，〈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序〉（1932年7月24日），《胡適文存》，合肥：黃山書社，1996。
- 顧頤剛編，〈北京孔德學校圖書館所藏蒙古車王府曲本分類目錄〉，《孔德月刊》，第4期，1927年1月。
- 徐朔方，〈論孟稱舜的戲曲創作〉，《戲曲研究》，第33輯，北京：文化藝術，1990。
-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譜》，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 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傅芸子，《白川集》，東京：文求堂，1943。
- 黃仕忠，〈顧太清的戲曲創作與早年經歷〉，《文學遺產》，2006年第6期，頁88-95。
- 黃仕忠，〈車王府藏曲本考〉（未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研討會論文，2006年12月8日，頁229-271。
- 黃仕忠編，〈雙紅堂文庫藏民初北京排印本唱本目錄〉，《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51冊，2007年3月。
- 奧野信太郎著，《隨筆北京》，東京：平凡社，1990。
- 齊森華等主編，《中國曲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劉復、李家瑞編，《中國俗曲總目稿》，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2。
- 鄧長風，《明清戲曲家考略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A Study of Operas in the Sokodo-Bunko (Shuang Hong Tang Library)

Huang Shizhong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The Sokodo-Bunko in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s the former collection of Dr. Nagasawa Kikuya, Professor at Hosei University and bibliographer. The operas in this collection are very diverse and include many rare copies. However, they have so far never been comprehensively presented and studied for which reason this article will undertake an attempt to present and study them.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First part: a presentation of the collecting process of traditional and popular operas by Nagasawa Kikuya. Nagasawa Kikuya went in and out of bookshops with his grandfather when he was a child and took delight in searching for antique books. Later he studied from Shionoya On and began to develop an interest in operas and novels. At university in Japan he discovered the only existing copy of the opera *Jiao Hong Ji* (Golden Boy and Jade Maiden) published in the tenth year of Xuande reign of the Ming Dynasty (1435). He travelled to China six times between 1927 and 1932 and thus developed his studies of the bibliography with a focus on Chinese literature. He also bought Chinese books for the Seikado library. By getting to know Ma Lian, a researcher and expert on operas and novels he wa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he book collection in the Auguste Comte School in Peking. Nagasawa Kikuya especially devoted himself to the collection of transcripts of operas. His activities had a direct impact o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in prompting them the collect documents of this kind. He furthermor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collecting editions of operas and novels that were made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by Japanese collectors. For this reason, his collection consists mainly of unique or very rare copi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buy a house, in the early 1950s Nagasawa sold his collection of operas and novels to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the Institute established the Sokodo-Bunko.

Second part: a present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Zaju* and *Chuanqi* opera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okodo-Bunko. This part consists mainly of a presentation of the

unique or rare copies of works of *Chuanqi* and *Zaju* and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ir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the opera and in bibliography.

Third part: a presentation of Qing dynasty *Yabu* (Kunqu) and *Huabu* (Luantan) operas and of popular operas in the collection of Sokodo-Bunko. The presentation focuses on transcripts from the court, on Baiben Zhang transcripts and on transcripts from performers and opera fans. (Translated by Günter Whittome)

Keywords: Nagasawa Kikuya, Sokodo-Bunko, rarities of operas and novels, popular operas